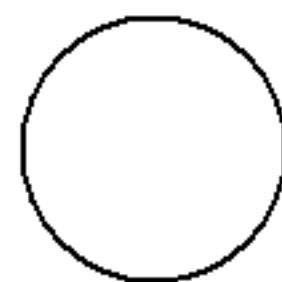


红旗

1964

16



一九六四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十六期 ★

目 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七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1)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4)

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

——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 本刊报道员 (7)

放手发动群众, 正确地领导农业的技术改革 ... 王任重 (12)

留有余地是一个积极的方针 李成瑞 (21)

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 许辛学 (26)

美帝国主义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石油资源的最大掠夺者 施经纶 (29)

佛教思想和中国哲学思想

——读《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 孔 繁 (40)

坚持革命方向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演出节目观后 王朝闻 (44)

☆ 八月三十一日出版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七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的来信。你们的这封来信，根本不理睬许多兄弟党要求团结、反对分裂的愿望，关死了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进行协商的大门，发出了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号令。

我们在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给你们来信中指出：“你们已经下定决心，要蛮横地、片面地、非法地筹备和召开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你们已经“为兄弟党国际会议规定了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和分裂主义的组织路线”。“你们把一切都盘算好了：开什么样的会，什么人筹备，什么人参加，什么人召集，一切都是你们说了算。在你们看来，所有的兄弟党都只不过是傀儡，只有听从你们发号施令的资格。”我们在信中还向你们说明利害，指出你们召开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分裂小会是自寻绝路，并且诚恳地劝告你们悬崖勒马。

你们在七月三十日的来信中，完全不理睬我们七月二十八日给你们来信的信。对于最近许多兄弟党反对匆匆忙忙地召开分裂会议的呼声，你们也一律当作耳边风。

你们在这次来信中蛮横地规定：不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达成一致的协议，就召开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只能是你們所指定的二十六个党，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行，再无商量之余地。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必须赶紧向你们呈报代表团的名单，并且在今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去莫斯科报到，不得有誤。

你们甚至等不及你们所指定的起草委员会开会，就规定国际会议要在明年年中举行。

你们的来信还悍然宣布，不管兄弟党参加不参加，你们指定的起草委员会都要如期开张，



你們片面召开的国际會議都要如期举行。

这样，你們在今年十二月召开起草委员会的那一天，就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日子，記載在历史上。

你們的来信，为了欺騙輿論，說了許多花言巧語。你們說，你們要召开国际會議，是为了“維護”和“加强”團結，而不是为了搞分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起碼应当在有关筹备和召开兄弟党国际會議的程序和步驟的所有問題上，由全世界所有的兄弟党根据平等协商的原則，通过双边的或多边的会談，达成一致的協議。但是你們現在彻底地破坏了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則，根本不考虑兄弟党反对匆忙开会的意見，不管兄弟党参加不参加都要开会。这哪里有一絲一毫要團結的影子呢？这不是明明白白要搞分裂嗎？

你們說，你們要召开国际會議，是为了“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这更是騙人的鬼話。兄弟党共同的东西是有的，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則。你們早就把这些共同的东西撇在一边，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你們現在不仅絲毫沒有表示要放弃你們的修正主义路綫，而且执意要把这条路綫强加于国际會議，那么，你們同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間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

今天，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面前的最迫切的共同任务，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你們却一心一意地勾結美帝国主义，寻找使你們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你們一再向美帝国主义表白，你們要从所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前綫脱身出来。当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犯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你們不但沒有明白宣布支持越南反对美国侵略，反而助紂为虐，积极支持美帝国主义通过联合国干涉越南。在你們执行这种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路綫的情况下，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同你們达成什么協議、采取什么共同行动呢？

你們还使用了种种威胁的手段，来恫吓我們和其他兄弟党。你們所仗恃的，无非是勾結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利用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托洛茨基分子、变节者和叛徒，放肆地对兄弟党进行顛覆和破坏活动。你們这样作也沒有什么了不起，你們过去已經作得够多了。你們越是这样作，就越是走向你們自己願望的反面。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是你们顛覆不了、破坏不了的。它們只会在同你們的斗争中更加坚强和壮大起来。而你們这种卑鄙的行徑，只能进一步暴露你們背叛革命的眞面目。“蚍蜉撼树談何易”，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加上修正主义者，总共也不过是将被抛进历史垃圾箱的一小撮人。



我們已經多次說过，关于国际會議的筹备、召开和参加成員等所有問題，必須由全世界所有的兄弟党，包括原有的、重建的和新成立的兄弟党，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意見。否則，不論你們召开什么样的起草委員會，什么样的国际會議，統統都是非法的。

我們決不受你們花言巧語的欺騙，決不向你們的威胁恫吓屈服，決不能當你們的分裂勾當的同謀者，決不能分擔你們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責任。如果我們去参加你們的分裂會議，就等于使你們的非法活动合法化，就等于承認你們有权撕毀宣言和声明規定的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則，就等于承認你們是老子党。我們对原則負責，对历史負責，当然絕對不会这样作。

我們重申中共中央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給苏共中央信件中的立場：

“中国共产党坚持主张召开經過充分准备的、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團結的兄弟党国际會議，坚决反对你們开分裂會議。

“中共中央庄严地声明，我們决不參加你們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會議和它的筹备會議。”

你們片面決定在今年十二月召开起草委員會，明年年中召开国际會議，你們必須承擔由此产生的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后果。

中国共产党，同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决心更高地举起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更高地举起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團結旗帜，更高地举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旗帜，把反对你們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們已經警告过你們：你們召开分裂會議之日，就是进入坟墓之时。你們七月三十日的来信表明，你們不顾一切后果，又朝着自己挖掘的坟墓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在这个紧迫的时刻，究竟是自走絕路，还是回头是岸，希望你們权衡利害，善自抉择。

致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日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 七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委员会已经把六月十五日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发给了所有的兄弟党。在那封信里，阐述了有关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主要问题的立场，并且提出了关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措施的具体建议。

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兄弟党都表示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我们队伍中产生的困难。它们主张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新的国际会议，而且许多党都坚持这种会议的召开不能长期拖延。

苏共中央认为，兄弟党的这种立场再一次证明它们非常关心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再一次证明它们意识到了当前局势赋予共产党人的崇高责任。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闭眼不看这样一点：四年前我们队伍中产生的分歧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日趋严重了。思想分歧已经发展成为公开的冲突，如果不采取措施，这种公开冲突就会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所有这一切，对于各国共产党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活动非常不利，危害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会削弱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力。

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我们的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打算利用共产党人队伍中的不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派，尤其是在美国，正在加紧活动，力图加强自己的阵地，对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展开进攻，企图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加剧战争威胁。

任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的党对于事态的这种发展都不能无动于衷。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我们共产党人去解决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任何一个党都不可能单独地去解决涉及整个运动的利益和命运的各种问题。在这里需要所有兄弟党、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同地集体努力。各国兄弟党正是由于得出这种结论，才坚持主张组织新的国际会议，认为它是克服分歧和制定共同立场的经过考验的方法。



大家知道，兄弟党在一九五七年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下述决议：“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到目前为止，必要的协商已经进行了，关于召集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问题已经足够详细地和全面地讨论过了，所有共产党的立场也都清楚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实际解决这个问题。苏共中央考虑到绝大多数兄弟党已经明确表示的意志，认为已经到了开始筹备召集国际会议的工作的时候了。我们认为，今年就应该召开起草委员会。由于在事先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已经看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问题会成为召开起草委员会的新的障碍，我们认为，唯一合理的出路是按照筹备一九六〇年会议时的成员来召集起草委员会，即由下述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组成：澳大利亚、阿尔巴尼亚、阿根廷、保加利亚、巴西、英国、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德、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美国、叙利亚、苏联、芬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日本。

苏共中央邀请上述兄弟党的代表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到达莫斯科，以便开始筹备国际会议的实际工作。

如果起草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能在全体成员参加下投入工作，那无疑是符合共同的愿望的。但是，我们认为，即使二十六个共产党中任何一个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

按照前几次会议的经验，起草委员会将准备提交国际会议讨论的主要文件的草案。委员会可以讨论与举行国际会议有关的所有问题，并且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起草委员会应该把它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建议和提建议发给所有的兄弟党。

苏共中央表示相信，尽管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复杂的局势，现在仍然有一切理由使起草委员会顺利地完成任务。在委员会完成必要的筹备工作以后，应该在它所规定的期限内召开国际会议。

关于会议的目的和前景，苏共中央已经在六月十五日的信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我们想再一次强调，对于我们来说，会议问题是同维护和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召开会议不是为了对谁进行谴责，把谁“革除”出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给谁戴污辱性的帽子，相互进行不负责任的指责。这样的话，可以取得的将不是加强团结，而只是进一步分离。我们认为，会议应该集中自己的努力，来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服已经产生的分歧的途径。

苏共中央认为，每一个兄弟党都可以坦率地和认真地在会议上陈述自己的观点，以便使自己的观点在制定共同的路线和共同的决议时得到考虑，并且听取其他党的意见。



看来，前几次会议的决议，即规定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将成为新的会议开始工作的起点。而且，新的会议在确认宣言和声明的原则的同时，可以对所走过的阶段进行总结，交流经验，把摆在世界共产主义面前的所有问题研究一遍，并根据国际局势已经发生的变动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集体地分析最后一次国际会议以来四年中所发生的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现象和过程，协调评价和立场，根据这些评价和立场来丰富共同的政治路线并使之具体化，——我们认为，这就是新的国际会议的最重要的任务。

苏共同其他兄弟党一样，完全清楚地了解，在存在尖锐分歧的情况下举行会议是件困难而又复杂的事情。不论所有一贯主张团结的人怎样力求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可能在会议过程中不会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深信，这也并不意味着使分裂“肯定下来”，不意味着为继续寻找走向团结的途径制造了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试图就下述问题达成协议：会议的参加者承担义务考虑所有兄弟党的意见，在发现立场和利益相同的那些领域里善意地进行合作，今后不采取任何会使困难加深和只会使阶级敌人高兴的行动。

我们希望，所有兄弟党都将以应有的注意来研究这些建议，利用会议召开之前的这段时间来深入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势，并且对讨论和寻求克服困难的途径做出建设性的贡献。

我们深信，只要起草委员会一制定出文件草案，国际会议就可以开始工作，时间大约在一九六五年年中，而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任何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参加过一九六〇年会议的所有八十一个党的代表都可以参加国际会议。这一个或那一个党拒绝参加集体工作，都不能成为再行拖延实行业已成熟的措施的理由，而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则在于制定加强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国际主义团结的途径和方法。

苏共中央相信上述建议是符合世界共产主义的最高利益的，是符合加强现时代一切进步革命力量的团结的利益，相信这些建议反映了绝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意志，期望已经拟定的各项措施将及时得到实行，并且取得成功。

为了使我們能够让所有兄弟党都了解会议的筹备工作情况，請你們把你們参加起草委员会工作的代表团成员通知我们。

致共产主义敬礼

苏共中央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



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

——关于楊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的討論报道

本刊报道員

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正在开展着一場新的激烈的論战，这就是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論战。

这是一场坚持唯物辩证法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即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一分为二”的，站在唯物辩证法一方；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合二而一”的，站在反唯物辩证法一方。論战的双方陣綫分明，针锋相对。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

这场論战，如果从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艾恒武、林青山同志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文章算起，到现在，持续进行有三个月了。为了深入了解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論战的情况，便于进一步推动这一場論战，本刊編輯部在八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召开了座談会，参加者有高级党校的干部和学员多人。会后又对有关同志作了个别訪問。

现将座談和訪問的情况报道如下。

这场論战是由楊献珍同志挑起来的

参加座談会的同志說，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論战，早在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发表之前，在高级党校里就开始了。

大家首先回忆近几年来情况說，为了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相适应，我们党在报刊上加强了关于“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的宣传。

我们党指出：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說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說，就一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面，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說。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

我们党又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或那种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



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我们党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所谓“新概念”，指出他们的所谓“新概念”的意思是，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各种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正在消失，各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正在合而为一。例如，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各个垄断资本集团等等互相冲突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内的矛盾，这些都正在合而为一，或者将要合而为一。

“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愈来愈为广大同志和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他们正确认识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有力思想武器。它帮助人们认清帝国主义同世界革命人民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它增强了人们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及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勇气，增强了人们取得胜利的信心。

可是，正在我们党加强宣传“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的同时，杨献珍同志却大讲其所谓“合二而一”论，向党大唱对台戏。

杨献珍同志的调和矛盾、否定斗争的思想，很早就有了。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他在高级党校讲课的时候就说，“对立面的统一、矛盾的统一的意思就是说：两个对立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我们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对立着的两个思想联系起来。”

党对“一分为二”的宣传加强了，杨献珍同志对调和矛盾的思想的散布，也越来越多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他在高级党校讲课时，公开地把他的调和矛盾的思想概括为“合二而一”。

一九六四年四月，杨献珍同志在高级党校新疆班讲课的时候，便进一步地发挥了“合二而一”的论点，把它讲得更加“系统”、更加“完整”了。

接着，杨献珍同志千方百计地宣传他的“合二而一”论，企图把他的反辩证法的观点塞到他所能塞到的地方去。

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同志也在课堂上宣扬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五月十四日，黎明讲课时说，现在“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少了。他还鼓动大家写文章来宣传“合二而一”论。黎明所谓“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少了，实际上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辩证法讲多了，杨献珍同志的反辩证法观点讲少了，应该多写文章宣传反辩证法的观点。

艾恒武、林青山都说，他们在写“合二而一”文章的过程中，曾多次同杨献珍同志商量。杨献珍同志帮他们修改。黎明也两次给文章提了意见并作了修改。艾恒武说，当他们听到有人说“合二而一”是标新立异，因而拿不定主意是否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又去询问杨献珍同志。杨献珍同志说：“谁说是标新立异？这是无知。”他接着说：“‘合二而一’是世界观，‘一



分为二’是方法論。”不久，楊献珍同志又給艾恒武、林青山鼓气說：“文章的观点站得住脚，拿出去吧！”

这样，楊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就通过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从高級党校搬到社会上来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爭論，也就在报刊上展开了。

这场哲学上的論战是由楊献珍同志这样地挑起来的。

对楊献珍同志“合二而一”論的批判

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高級党校的领导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原則問題的爭論，是革命辯证法同反辯证法的爭論，通知哲学教研室要討論這個問題。黎明把这个通知告訴楊献珍同志。楊献珍同志听了很生气，对这个討論大为不满。

七月十七日，王中、郭佩衡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揭露和批判楊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的文章。

这时候，高級党校不少同志在校内刊物上写文章和在討論会上发言批駁“合二而一”論。但是，还有一些人坚持“合二而一”論。

楊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爭論。一方面，有一部分人表示响应和支持“合二而一”論。另一方面，很多人对“合二而一”論給予了批判。到八月底止，各地报刊上发表的討論文章共达九十余篇。許多地方的党校、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的理論工作者，还举行了多次座談会。

目前这场論战的中心问题是，承认不承认对立統一規律是客观事物的根本規律，承认不承认唯物辯证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高級党校大多数學員和工作人員，从楊献珍同志等人的一系列言行中，清楚地認識到楊献珍同志在这个时候发表“合二而一”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来对抗无产阶级的唯物辯证法的世界观。

参加座談会的同志說，楊献珍同志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宣传“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大讲特讲对立面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事物的“不可分性”，大讲特讲研究对立面的統一的任务仅仅在于寻找“共同要求”，“求同存异”。在他这种“合二而一”的观点里，事物的内部矛盾不見了，事物内部对立面的斗争不見了，矛盾的一方必然要克服另一方，斗争的结果导致旧統一体的破裂和新統一体的产生，旧事物要为新事物所代替，这些也都不見了。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辯证法。

“一分为二”是革命的唯物辯证法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用这种世界观来观察事物，承认矛盾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承认矛盾的双方又統一又斗争，承认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对立面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因此，唯物辯证法的任务，从来不是掩盖矛盾，而是揭露矛盾，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促使矛盾轉化，达



到革命地改造世界的目的。无产阶级用这种世界观来分析阶级社会，就是要承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承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坚持无产阶级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实现社会的变革。

但是，按照杨献珍同志所主张的“合二而一”论来观察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必然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导致阶级调和论。

杨献珍同志和艾恒武、林青山同志对我们党制定方针、路线、政策的依据，作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歪曲。他们把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原则，党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文化政策，等等，都硬说成是按照他们的“合二而一”的观点制定的。这样，他们自己又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原则问题，而为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辩护的人却不愿意说这是政治原则问题，甚至有所用心地说什么不要把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

有的同志还说，杨献珍同志把“合二而一”说成是世界观，把“一分为二”说成是方法论，这根本违背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致的原理。其实，杨献珍同志一再强调学习辩证法的目的“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本事”，正是表明他的“合二而一”的世界观和“合二而一”的方法论的完全一致。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①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正是把矛盾双方的联系“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他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这类观点，企图迷惑许多人，起着为反动阶级服务的作用。

在争论中，有些人提出了一些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大同小异的说法。例如，有的说，“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只是用语之争、词句之争，并且说什么在课堂上讲课，谁不能说一句半句错话。有的以貌似全面、公正的姿态，提出要用“合二而一”补充“一分为二”，使“合二而一”成为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方面，说这样才不会有“片面性”。有的装着要对矛盾作具体分析的样子，将矛盾划分为“以同一性为主”和“以斗争性为主”两类，说什么处理“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要“合二而一”。有的把“一分为二”说成是分析方法，“合二而一”是综合方法，说它们都是辩证的认知方法的组成部分。这些说法，其实都不过是为“合二而一”论辩护而已。

许多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分为二”有确定的含义；杨献珍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也有确定的含义。“一分为二”这个术语，极其准确、生动而又通俗地表达了辩证法的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的实质。而杨献珍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则是系统的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怎么能够把两者不加区别地混合在一起呢？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18页。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座谈会上，许多同志都谈到这场哲学论战的重要意义。

哲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有鲜明的党性即阶级性的。哲学战线上的斗争，总是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在阶级斗争中，不同阶级必然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并且把这种不同的看法，从哲学上作出概括，或者是革命的概括，或者是反动的概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哲学，有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这样，在哲学战线上就表现了对立的党派的斗争。无产阶级队伍内部的一些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一些受资产阶级世界观影响的人，也往往用资产阶级哲学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

现在，在国际上，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发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在我国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一些封建残余势力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正发展到一个新的深化的阶段。面对着国际国内这种阶级斗争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强调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武装人民群众，提出要在我国城乡中广泛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粉碎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进攻。杨献珍同志在这时候大肆宣扬“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事情很清楚，哲学战线上这场谁战胜谁的新论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我国哲学战线上出现这场论战，不是不可理解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也必不可免地尖锐化起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苏联社会处在大变动时期。农业集体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的开展，富农阶级和资产阶级势力的拚命反抗，使苏联社会上阶级斗争尖锐起来，这时，苏联共产党内出现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反党集团。经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愈深入，在各个阶级、阶层中引起的思想上的震动也愈剧烈。正是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德波林的反辩证法的哲学观点成为反党集团的思想工具，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则对德波林派哲学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个思想领域的斗争，正是当时苏联社会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

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的这场论战还在继续进行。就这场大论战参加人数之众多，影响的广泛以及意义的重大来说，是我国学术界多少年来所罕见的。这场论战，看来，离开结束的时候还很远，论战还在一步一步地深入发展。真理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通过这场论战，辩证法思想一定能战胜反辩证法思想，人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将会大大提高一步。



放手发动群众，正确地领导农业的技术改革

王任重

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农业的集体化和农业的现代化，是这一条路线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有实现集体化，才能够实行大规模的农业技术改革。只有实行技术改革，农业的集体经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巩固和迅速的发展。这条路线的正确性，已经为多年来农业发展的经验所证明。

一九六三年，湖北省的粮食继续增产，棉花大幅度增产，其他许多农副产品，比一九六二年也都有较大的增长。一九六三年的大丰收是怎样得来的呢？这当然不只是一九六三年一年工作的结果，而是多年来高举党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伟大红旗，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工作的结果，

是广大农民在集体生产中进一步发挥劳动积极性的结果。从领导方面来说，正如广大社员所反映的，丰收的得来是由于：党的政策好，社会主义教育好，干部作风好，技术改革好，国家支援好。

社员群众把农业技术改革作为取得丰收的基本原因之一，不是偶然的。农业合作化以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我们积极地进行了农业技术改革的工作。社员群众从他们的实践经验中，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了技术改革对农业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同一九五七年比较，一九六三年全省农田的有效灌溉面积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保证灌溉面积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九点六；化肥增加了二点一倍，绿肥面积也扩大了很多；排灌动力增加了二十倍（按马力计算），拖拉机增加了六点八倍（按标准台计算），脱粒、加工等机械也都有很大的增长。稻、麦、棉等主要作物的良种，已经大面积推广。农药和农药器械已经大量使用。主要作物的栽培技术，也都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棉花栽培技术的革新更为显著。一九六三年湖北省的农业生产获得丰收，气候条件比较好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如果没有上述这些改革，即使气候条件较好，也不可能获得这样大的增产。一九六三年全省还出现了一批稳产高产的队、社、区、县，它们不仅战胜了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而且使农业生产大大超过了以往丰收年的水平。在这些地方，技术改革的好处就更加显著了。

例如，浠水县望城公社十月大队（前身即饶兴礼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湖北省农村中坚持技术改革的一面红旗。十月大队人多地



少，平均每人不到一亩耕地。单干时期，作物以一季中稻为主，亩产一般四百多斤，好的也不过六百多斤。一九五二年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只两三年的时间，中稻平均亩产就提高到六百多斤，显示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生产的进一步提高遇到了困难，中稻单产总是突不破七百斤的关。一些怀疑动摇的思想出来了，说什么“生产到了顶”，说什么“合作社只有三年的优越性”等等。饶兴礼同志和大队党支部，在这个困难面前没有退缩，他们坚决按照党的指示，领导群众走上了技术改革的道路。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奋斗，他们排除万难，实现了水利化和排灌、脱粒、加工的机械化。改造了低产田，改良了水稻品种，化肥和农药也大大增加。随着这些生产条件的改善，他们成功地推广了双季稻，实行了高度的精耕细作，创造了全大队水田全年平均亩产粮食一千三百多斤的高产成绩，使粮食总产量在最近八年内增长了一倍。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他们还利用技术改革所创造的条件，发展多种经营，使经济收入也得到了迅速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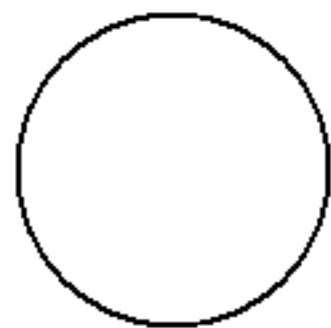
又如，沔阳县过去是洪涝灾害频繁的地区，是湖北省有名的“十年九不收”的县。一九五四年大水灾以后，特别是在人民公社化以后，沔阳县在国家的扶植下，充分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的力量，有计划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初步实现了河网化，同时在耕作技术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使农业生产基本上做到了旱涝保收，并且出现了稳定增产、大幅度增产的局面。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三年十年当中，除一九五四年遭受

了特大水灾外，其余九年连年丰收，由原来没有多少余粮的县变成了每年能上调七、八千万斤粮食的余粮县，棉花总产量一九六三年比一九五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九点二。

这些由于进行农业技术改革而大增产的典型，有的在平原地区，有的在丘陵地区或大山区。有的人多地少，有的人少地多。有的条件比较好，有的条件很差。它们有的是经过三年、五年，有的是经过八年、十年，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面貌。它们的经验证明，不论什么地区，不论条件好坏，只要有高度的革命干劲，又有科学的态度，扎扎实实地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的工作，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就能够做出成绩来。

我们从农业技术改革工作的实践中，总结了这样一条基本经验：“大改大增产，小改小增产，不改不增产，乱改就减产。”大改是根本性的改革，也就是逐步实现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技术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大改，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小改是非根本性的改革，但也是不可缺少的，我们要集小改为大改。湖北省现在已经出现的一批稳产高产的队、社、区、县，就都是“大改大增产”的典型。“乱改就减产”，也是我们总结一些地方、一个时期改得不好的经验中得来的一条教训。我们把“乱改就减产”作为基本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了使大家记住这条教训，把坚持改革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把加强领导和贯彻群众路线统一起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革。

我们的农业技术改革工作并不是一帆风



順的，而是走的曲折的道路。我們的認識，是在不斷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的過程中，逐步提高起來的。我們的工作，是在不斷發揚成績、糾正缺點的过程中，逐步發展起來的。湖北省過去幾年的農業技術改革工作中，有過一些缺點和錯誤，但是總的來講，成績是主要的，並且取得了許多正面的經驗，而一些反面的經驗在經過總結之後，也就變成了寶貴的財富。特別重要的是，這些經驗不僅是少數領導人和技術專家的經驗，而且已經成為廣大幹部和群眾共同的經驗。這一點，正是我們前進的基礎，也是我們奪取新勝利的最可靠的保證。只要我們堅決地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並且善於總結自己實踐的經驗，就一定能夠使農業技術改革的工作多快好省地向前發展。

現在，在農業生產已經出現了新的高潮的形勢下，如何進一步做好農業技術改革工作，對於發展農業生產、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有着更加重大和迫切的意義。一九六二年九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明確指示我們，要動員和集中全黨全國的力量，積極地、尽可能地支援農業，支援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分批分期地、因地制宜地實現農業的技術改革。正是從這一個要求出發，我們感到很有必要再一次總結經驗，發揚成績，克服缺點，把農業技術改革工作提到一個新的、更高的水平。

怎樣正確地進行農業技術改革？從湖北省十多年的經驗來看，我們體會比較深的有以下几个問題：

第一，以穩產高產為目標。

農業技術改革必須有明確的目的，講求經濟效果。

最近，黨中央提出了在種好十六億畝農田、全面增產的基礎上，分期分批地建設旱澇保收、穩產高產農田的任務，並且指出這是發展我國農業生產的主要方向。把穩產高產作為農業技術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完全符合湖北省的情況的。

穩產，就是要達到旱澇保收，穩定增產。農業生產的最大威脅是自然災害，主要又是旱澇災害。不擺脫這個威脅，農業生產就不能順利地向前發展。因此，穩產是高產的基礎。實現了穩產，旱澇保收，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高產。

高產，就是要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增加總產量。總產量取決於兩個因素：一個是種植面積的多少，一個是單位面積產量的高低。增加總產量，也不外乎從擴大種植面積和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兩個方面來努力。這兩個方面都是不可忽視的。從湖北省的實際情況來看，總的特點是人多地少，大部分地區可開墾的荒地已經不多或者沒有。因此，就全省來說，增加總產量的主要途徑只能是在保證種植面積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力求大面積平衡增產。

湖北省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潛力是很大的。水稻，高產田的單位面積產量達到七、八百斤以上，而占水田總面積將近百分之十五的低產田，單位面積產量還在三百斤以下。棉花，高產田的單位面積產量達到八十斤（皮棉）以上，而占棉田總面積將近四分之一的低產田，單位面積產量還不到三十五斤。大力改造低產田，提高全省的單位面積產量，就可以使總產量得到很大的增長。

低產田增產有很大的潛力，高產田繼續



增产也有很大的潜力。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有限度的。但是，如果通过技术改革改善了生产条件，就可以突破原来的限度，使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更高的水平。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一般的高产田是七、八百斤，突出的高产田就突破了一千斤，十月大队还达到了一千三百多斤。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一般的高产田是八十斤(皮棉)以上，突出的高产田就突破了一百斤，有的大队还达到了一百五十斤。这种高产水平既然已经出现，而且是大队范围的平均水平，就证明它是能够做到的，可以作为大面积增产的努力方向。

强调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必须以保证种植面积为前提，必须同大面积平衡增产相联系。如果用缩小种植面积的办法来保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或者因为追求小面积的高产纪录而影响了大面积的生产，一部分田的单位面积产量虽然提高了，但是总产量却减少了，那就不仅失去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意义，而且是对生产的损害了。

同样，就是增加总产量，也不能只顾一季或一年，而要顾到全年的增产，几年持续的增产。有些技术改革的措施，只对一季或一年的增产有利，而对下一季、下一年的生产不利，结果上一季、上一年增产，下一季、下一年减产，增减相抵，甚至蚀了本。这就需要从全年增产、几年持续增产的要求出发，全面权衡利弊得失，作出正确的安排。

第二，以水、肥、机、土为基础，全面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农业增产“八字宪法”，为农业技术改革提出了一个正

确的纲领。我们的农业技术改革，就是按照这个纲领进行的。

“八字宪法”的各个方面，即水（兴修水利）、肥（增施肥料）、土（改良土壤）、种（选用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工（改革工具）、管（培育管理），是有机地互相关联着的，不能孤立地只抓其中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必须全面地实行，才能保证稳产高产。

十月大队的水稻技术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十月大队水稻技术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推行和扩大双季稻的种植，增加复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那里的气候条件可以种植双季稻。经过反复的试验，品种和栽培技术的问题也解决了。但是，在改种双季稻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种双季稻，就得有双季的水，还要有双季的肥。抢割早稻、抢插晚稻的季节很短，又必须解决“双抢”期间劳动力和耕牛不足的问题。除此以外，还要改造落后田，消灭螟害，提高栽培技术，加强田间管理。他们正是全面地进行了这一系列的改革，才取得了水田亩产粮食一千三百多斤的优异成绩。相反，有一些地方在改革耕作制度上的成绩不够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孤立地进行一个方面的改革，而其他有关的许多项目没有能跟上去。

当然，全面贯彻“八字宪法”，并不是要求我们无重点地齐头并进。“八字宪法”的各个方面并不是平列的。而且由于具体条件的不同，各个地区在全面贯彻“八字宪法”的过程中，每一时期都应当有其侧重的方面，也就是说，必须善于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抓主要环节。从湖北省的情况来说，水、肥、



机、土这四个方面是基础。这几个方面的改革,都属于生产条件的改革。建设稳产高产农田,就要着重解决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从湖北省目前的情况看,在水、肥、机、土四项当中,水利和肥料又是当先的两项。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农业生产能不能稳定,主要看水利,能不能增产,头一条也要看水利。水利条件不改善,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方面的许多重大改革,如旱地改水田、一季改两季等就不能进行。而且由于车水抗旱要占去大量的劳动力,势必要影响精耕细作。湖北省从一九五二年至现在,一直对水利工作抓得比较紧,经验证明这是抓得对的。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争取全省水利建设基本过关。

增加肥料,除了农家肥、绿肥之外,还要增加化肥。近年来,国家供应的化肥不断增加,这是湖北省获得农业丰收,特别是棉花大幅度增产的一个重要因素。几年来使用化肥的经验证明,要把化肥和有机肥料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最好的增产效果。

水、肥当先,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的。从长远来看,改革生产工具,逐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是农业技术改革的基本问题。湖北省各地农业机械试点的经验证明,不仅土地多劳动力少的地方需要机械,即使是土地少劳动力多的地方也需要机械。因为有了机械,就能抢住耕种季节,扩大复种指数,实行精耕细作;就能解决抗旱、排涝同田间管理的矛盾;就能抽出劳动力大搞积肥和副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一句话,就能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所以说,农业要最后过关,还是要靠机械化、电气化。问题是在发展机

械的时候,必须注意把机械化所节省出来的劳动力充分利用起来,去扩大生产的范围和规模。同时,在机械化的内容和步骤上,要注意从生产的需要和条件出发,不要一谈机械化就是要搞机耕。从湖北全省大部分丘陵地区、山区和水田地区来说,首先是解决排灌、脱粒、加工和运输机械化的问题,其次才是解决耕作机械化的问题。在逐步实现机械化的过程中,还要重视改良农具,开展群众性的工具改革运动。有了机械以后,还要把机械管好用好。

第三,全面规划。

从根本上改变自然面貌,改造农业生产的条件,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有计划有步骤地去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革,要依靠农业和工业、商业、文教等各方面共同的努力,有一个全面的规划作为指导,才便于统一组织和协调各方面的力量。技术改革主要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有一个全面规划作为奋斗目标 and 行动纲领,就有利于引导群众看清前途,树立雄心壮志,使技术改革真正成为群众自觉的行动。

有人说,农业生产不稳定,技术改革牵涉的方面又复杂,规划很难搞准确,有没有必要搞全面规划、长期规划?应该承认,他们反映的一些困难确实存在,但是,不能因为有这些困难,就否定全面规划。农业的技术改革,没有国家的支援不行,没有集体经济单位自己的努力更不行。全面规划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把国家的支援和人民公社自己的努力正确地结合起来,把国家的统一规划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自己的规划衔接起来,使国家的力量和集体经济的力量



都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这样的全面规划，的确不可能搞得很准确，而实际上也不需要很准确。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大体上符合实际的规划。实践证明，规划越细越死，就越不能适应实际情况的变化。如果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和群众讨论，在一些主要的方面提出指标和措施，同时把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结合起来，一面以计划为指导，一面又在实践中对计划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那么，我们是完全能够制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全面规划来的。

全面规划要具体体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和要求。干劲要鼓足，措施要落实，而规划工作的重点要放在措施落实上。为了达到总路线提出的多快好省的要求，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贯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在全面规划当中，必须根据这一原则，从全局出发，抓住重点，分期分批地建设稳产高产农田。国家的投资和领导的重点，首先要集中用在那些生产条件较好，又是出产商品粮和工业原料较多的地方。从每个公社和大队、生产队来说，都要学习大寨，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使用自己的力量时，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抓住重点，分别轻重缓急，避免力量分散，战线过长。

对于技术改革的各项措施，还要从生产的总体利益出发，权衡利弊得失，进行全面安排。事情往往是有利有弊。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利多弊少的事情就办，利少弊多的事情就不办。例如围垦湖荒，从多种粮食的角度来看是件好事，可是如果把芦苇都砍光了，影响到工业需要的原料，或者影响了排涝，影响了蓄洪，就得不偿失。究竟哪些湖荒可以围垦，哪些湖荒要保存芦苇，就要具

体调查和分析比较。至于像山区毁林开荒，造成水土流失，这种肯定是利少弊多的事情，就一定不要干。

在制订全面规划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到发展农业生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农业生产搞得好不好，要看五年、十年，不能只看一年。在目前条件下，农业生产还不稳定，比一年是不容易看出高低来的。争先进、争上游，也不要争一时的高低，要扎扎实实地把基础打好，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真正达到稳产高产的目标。

第四，学习先进，因地制宜。

实行技术改革，必须努力学习新技术，推广新技术；努力学习先进经验，推广先进经验。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就不能前进。

但是，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地区差别。由于这种差别，在这一个地方是高产的作物，在另一个地方就可能是低产作物。在这一个地方是增产的措施，在另一个地方就可能造成减产。在这一个地方的这一个季节进行种植是适宜的，在另一个地方的同一季进行种植就可能误了农时。在这一个地方是办得到的事情，在另一个地方就可能行不通。因此，农业技术改革必须因地制宜，不能一律化，一刀切。学习、推广任何一项新技术和先进经验，都要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生搬硬套、机械模仿。同样是解决水利问题，随县主要靠水库，沔阳主要靠河网化，武昌主要靠电动排灌，办法不一样，可是都适合当地的特点，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样是推广双季稻，黄冈专区的沿江地区，人多地少，气候、水利、肥料等条件也比较适宜，大力推广双季稻就得到了成功，开辟了



一条重要的增产途径。而荆州专区有一部分地方如荆门县，虽然也可以种双季稻，但是人少地多，劳动力不足，水利和肥料也有困难，在这些問題没有得到解决以前，双季稻就推广不开。不因地制宜，就是违反科学，就是主观主义，就会给生产造成损失。

强调因地制宜，是要求我们切实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认真总结当地的生产经验，摸清当地的生产特点，更好地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技术改革。如果把因地制宜作为拒绝采用新技术新经验的挡箭牌，那就是保守思想在作怪，也会给生产带来损失。

第五，鼓足干劲，量力而为。

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必须鼓足干劲。在这个前提下，又要注意量力而为，有多少力量就办多少事，在计划安排上还要适当留有余地。凡是需要办而又能够办到的事情，一定要努力去办。凡是办不到的事情，就一定不要勉强去办。几年才能办到的事情，不要抢着在一年办完。当然，一年能办到的事情，也不要拖上几年。

技术改革的基本建设，要全面地衡量人力、物力、财力，正确处理当年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消费和积累的关系。我们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尽可能地集中更多的力量到基本建设上去，加速技术改革的发展。同时，我们又要注意在保证当年生产开支的基础上去安排基本建设，扩大再生产。大型水利搞得过多过急，既不能很快受益，又影响小型水利的修建，结果反而减少受益面积。基本建设把木材、竹子、钢铁用得太多了，农具、船只的修理和制造就会缺少材料。劳动力抽调得过多，就会影响抢

季节。如果当年生产都不能保证，必然反过来又影响基本建设的进行。要注意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既增加积累，又增加社员的收入。不增加积累，吃光分光，就不能进行基本建设。但是，积累过多，使社员不能增加收入、甚至减少收入，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还是不能搞好基本建设的。

从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的改革来讲，量力而为就是要按照客观条件的可能去办事。当然，农业生产的许多条件是可以改变的。我们首先应当鼓足干劲、发挥主观能动性，去积极改变条件，不应当消极等待。但是，在条件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就只能采取与这些条件相适应的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特别是耕作制度的改革，如夏秋两季的安排、早中晚稻的安排、粮棉的安排、茬口的安排等等，都要实事求是。如果条件还不具备就贸然改变，打乱了原来的耕作制度和茬口，就会在生产上造成损失，不仅不能增产，反而会减产。

第六，一切经过试验。

农业生产上的一切新技术，都必须经过试验，试验成功了再逐步推广。

任何一项技术改革，在试验当中要有冲锋陷阵、百折不挠的精神，碰了一两次钉子就收兵，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领导技术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广泛开展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大力支持技术改革的试验活动。当然，也必须注意试验和推广的界限，绝不可以没有试验成功或者效果还不稳定就贸然推广，那样就很可能造成重大的浪费和损失。

在技术改革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改革和继承的关系问题。改革是主导的一面，但又要继承的基础上去进行。我们在进行改



革的时候，要采取经过试验、逐步推广的办法，来正确处理这个关系。用群众的话来说就是：“新办法试点，老办法搞面，试验成功了，新办法代替老办法。”因此，在大力提倡革新的同时，还要教育干部和社员，特别是青年社员，认真继承一切有益的传统生产经验，练好农业生产的基本功。只有这样，才能搞好技术改革，也才能搞好当前生产。

进行技术改革的试验，要采取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农民三结合的办法，种试验田，办试验场。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精神，尊重技术人员和老农的意见，并且帮助他们提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历年的经验证明，农村工作干部善于向农民请教，向农业科学技术人员请教，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努力钻研生产知识，才能对技术改革工作有比较正确的领导，减少错误。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当学生，才能继续当先生。没有甘当一辈子小学生的精神，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就都会变成一句空话。

第七，放手发动群众。

农业的技术改革，同其他一切工作一样，必须贯彻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进行。依靠群众，就会势如破竹。离开了群众，必将一事无成。

放手发动群众的目的，是要启发群众对农业技术改革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对于群众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要积极加以支持，对于他们的好经验，要虚心学习，认真总结。为了组织群众自觉地进行技术改革，就要向群众进行深入的、耐心的宣传教

育，同群众一起调查研究和商量办事，并且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推广任何一项新技术，都要采取宣传的办法，示范的办法；都要发动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自己讨论决定。他们对本队的生产条件和生产情况，了解得最清楚。他们自己决定了，就实行。如果他们不同意，任何人都不得强制推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使农业的技术改革成为广大群众自觉的行动。

应当看到，增产是群众的迫切要求，真正能够增产的改革，群众是没有不欢迎的。有人说：“只要是为群众办好事，强迫命令也不要紧。”有人说：“强调群众自愿，技术改革就改不成。”这些说法，实际上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不愿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的表现。而其结果，往往是好心办了坏事。

还应当看到，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生产队又是基本核算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产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生产队的收入和社员的生活。农民群众对于自己还没有把握的事情，不肯轻易去做，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农村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认识到，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利，这是对群众利益高度负责。滥用自己的职权，瞎指挥生产，使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失而自己又不承担其后果，是极其恶劣的作风，是根本没有群众观点的表现。

第八，正确处理先进和保守的矛盾。

毛泽东同志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要教育农民，引导农民实行技术改革也要教育农民。

农业的技术改革，是农业生产上的一场革命，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先进和保



守的矛盾。农民群众一方面迫切要求发展农业生产，有进行技术改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小农的守旧心理和习惯势力，又束缚了他们的革新精神。因此，为了保证技术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坚持不懈地向他们进行技术改革的教育，不断地发扬先进思想，克服保守思想，帮助他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从小农的因循守旧的精神状态中彻底解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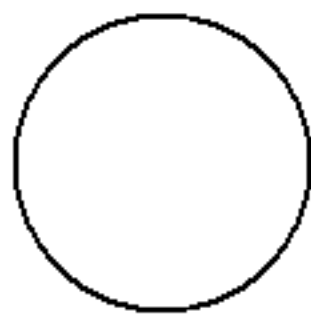
农业技术改革工作中先进和保守的矛盾，一般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思想上的矛盾。正确处理这一矛盾，首先要实事求是地划清是非界限，弄清楚究竟是合理的意见还是保守的思想。特别是要有听取反面意见的精神，决不可以把和自己不同的意见都说成是保守思想，更不可以把纯粹是技术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轻率地提高到政治倾向的问题上来。

其次，对真正是保守的思想，也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即说服教育、宣传示范的方法来解决，决不可以借口克服保守思想而违反群众自愿的原则。即使是正确的改革，如果群众一时不接受，也要耐心等待，用更大的力量去做好宣传和示范的工作，启发群众提高认识。这样做，看起来好像推迟了改革的时间，对生产不利，实际上是保护了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群众的自觉，不仅有利于当前的生产，而且可以推动今后的技术改革更好更快地进行。如果群众思想还不通的时候强迫群众去改，群众不积极，就是好事也不会办好，甚至办成坏事，造成减产，给今后的改革增加许多困难。离开了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任

何事情都是办不好的。

再次，要采取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方法，给后进者以切实的帮助。实践证明，这是提高后进的基本方法。歧视后进，是错误的态度。片面地“将军”，也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当然，对思想作风确实不好的人应当给以批评，这种批评也是对他们的帮助。但是，更重要的帮助还是要同他们一起找出落后的原因，结合他们的实际情况学习先进经验，并且帮助他们克服实际困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改进工作，改变落后面貌，向先进看齐。在同一个生产队内，社员与社员之间也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别。我们要支持先进分子的革新精神，又要耐心帮助落后的人，提高他们的认识。对待落后的人，不能采取讽刺打击的错误方法。

几年来，我们曾经多次总结过农业技术改革的经验。每一次总结，在认识上都有新的提高，都发现一些过去的认识当中的片面之处。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我们对技术改革的认识，是在实践当中逐步提高的。我们现在的经验，同过去比较，应当说是多一些了，但是仍然很不完整、不系统，还有许多问题要在今后的实践当中去进一步解决，感性的认识也有待于上升为理性的认识。我们应当更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加努力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认真总结经验，永远保持敢想敢干而又谦虚谨慎的作风，把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精神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农业技术改革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留有余地是一个积极的方针

李成瑞

在革命和建設工作中，我們做計劃、訂方案、办事情，都应当坚持这样一个方针：既要鼓足干劲，又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同志說过：“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①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就是調动一切积极因素，把群众的热情、智慧和力量充分动员起来，按照事物的客观規律，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实现多快好省的要求。“气可鼓而不可泄”。一切干劲不足、強調困难、安于现状、甘居中游的傾向，都是革命者所不取、所反对的。

在鼓足干劲的同时，还必须注意留有余地。計劃必須訂得积极，必須充分估計到一切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有利因素，但也必須切实可靠，决不可以无根据地把不可靠的“潜力”放在計劃之內。計劃确定以后，必須全力以赴，力爭全面和超額完成，但也要考虑到执行当中可能遇到的某些意外困难，准备在某些計劃指标不能全部完成时所能采取的措施。对物力、财力的分配，必須有利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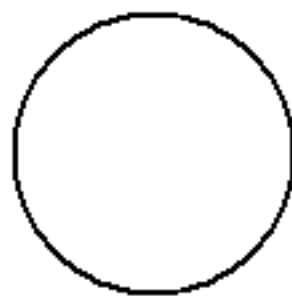
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但是，分配計劃必須留有余地，不能打得太滿，必須逐步增加国家的后备力量。这样才能使我們經常处于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要求。

留有余地是一个积极的方针。

社会主义經濟的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計劃工作的任务，就是根据經濟发展的这种規律，发现不平衡的問題，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必要的調整，实现新的平衡。这种自觉的調整，是社会主义計劃經濟优越性的表现。要做好这种調整，条件之一，就是国家計劃在财力物力的分配使用上留有一定的余地，保持一定的后备力量。为了促进經濟的发展，积极地組織新的平衡，必須留有余地，此其一。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們能够自觉地認識和运用客观規律，推动社会經濟的发展。但是，在主观和客观之間，常常还存在着或大或小的距离。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論》中說：“一般地說来，不論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

^①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16頁。



的实践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們，常常受着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① 当我們的主观認識同客观不一致的时候，就会加重經济发展中的不平衡，加重調整的必要性。为了准备在主观与客观之間出現不一致的时候，能够应付裕如，也需要保留一定的余地和后备力量，此其二。

我国的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着气候变化的影响。年度間的丰歉是不平衡的。丰收的时候，要想到歉收的时候。“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平时就应当作好准备，蓄积力量，以便在遇到較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能够以丰补歉，使国民經济不致受到过大的波动，能够比較順利地繼續向前发展。为了对付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必須留有余地，留有后备，此其三。

在我們面前还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动派，还有蔣介石匪帮。有帝国主义，就有产生战争的土壤。美帝国主义还霸占着我国領土台湾。蔣介石匪帮还在妄想重返大陆。对他們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絲毫不能麻痹。我們平时就要蓄积力量。不管他們在什么时候向我們发动襲击和进攻，保证能够予以彻底粉碎。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决不能有任何忽視。为了应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突然进攻，必須留有余地，留有后备，此共四。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四年曾經說过：“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預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綫。”^② 把这三件事进一步做好了，国家預算就更加巩固了，整个国民經济的发展也就有了更加可靠的保证。

鼓足干劲和留有余地，是相輔相成的。干劲鼓得越足，生产发展越快，劳动生产率越高，財力、物力的消耗定額越降低，就越能为留有余地創造有利的基础。这是基本的、主导的方面。同时，也必須看到，留有余地，可以保证生产更順利地发展，可以使各项指标經過努力超額完成，这就可以更好地鼓舞人們的干劲。留有余地，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

我們不論做什么事，都应当把高度的革命热情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結合起来；都应当在战略上藐視困难，在战术上重視困难；都应当爭取最好的前途，同时也作好最坏的准备。准备好两手，就有了主动权。既鼓足干劲，又留有余地，归根到底，是一个尊重客观規律的問題，是一个掌握主动权的問題。

二

既要鼓足干劲，又要留有余地这个原則，大家都是拥护的，坚持这个原則的道理，也是比較容易理解的。但是，怎样把这些原則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2頁。

② 轉引自邓小平《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預算草案的报告》。見財政經济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国家預算》，第20頁。



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里，只就财力、物力分配上怎样做到留有余地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要使财力、物力的分配留有适当的余地，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一系列的矛盾，包括需要与可能的矛盾，局部与整体的矛盾，生产与基建的矛盾，“长线”与“短线”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处理好了，才会真正留有余地。

我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解放以来，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惊人的发展，但整个说来，我们的生产水平还比较落后，国家还不富裕。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国防需要加速现代化，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需要逐步提高，在这里，需要同可能存在着矛盾。“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少花钱多办事”——这是处理需要与可能这个矛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我们一定要克勤克俭，开源节流，力求以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建设事业的安排上，需要同可能相结合，需要同可能受可能的制约。不仅要考虑一般的正常的需要，而且要留下余地，以便应付意外的临时的需要。

需要与可能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局部同整体的矛盾。处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部门的同志，总是对本地区、本部门的需要体会得深些，总是对本地区问题的迫切性了解得具体些，总是希望本地区、本部门的建设发展得快些、更快些。这种心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全国范围看，就不能不分别轻重缓急，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在最重要、最迫切的方面，而推迟或者减掉某些可以推

迟和减掉的事情。有些要兴办的事情，从局部看是合理的，从全局看，从轻重缓急的排队次序看，就成为不合理的，或者在某段时间内是不合理的。全局应当照顾局部，但首先应当是局部服从全局。如果不是这样，不分轻重，齐头并进，那就不可能做到统筹安排，不可能留有余地。

在各地区、各部门建设发展的需要中，有生产的需要，有基建的需要；有简单再生产的需要，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按照客观事物的规律，总是先生产，后基建，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再生产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自觉地首先保证简单再生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劳动手段即机器、设备、房屋的更新，当人们首先着眼于扩大再生产、着眼于扩建和新建企业的时候，某些原有企业的设备更新，就有可能暂时被挤到后边。原有企业进行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材料，同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建设所需要的原料、材料之间，流动资金同基本建设投资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如果不很好地注意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先生产、后基建，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再生产这样的客观要求，就不一定能够自觉地得到遵守。过了一段时间，简单再生产中的问题暴露出来，不得不去解决，但是财力、物力已经被扩大再生产占用去了，这时就出现了所谓“缺口”。“缺口”是留有余地的反面。我们要留有余地，就不应当留下这种“缺口”。

在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中，各部门之间、各个建设项目之间，重点项目与一般项目之



間，也存在着矛盾。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統籌兼顧、适当安排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則，是解决这一問題的重要方針。如果基本建設战线过长，就会出现財力、物力的过分紧张，就說不上留有余地。而且兴办的項目过多，资金使用过分分散，一定期間内能够修建完成投入生产的項目，就会相对减少，这对于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經济也是不利的。

在留有余地的問題上，还常常遇到“长綫”和“短綫”的矛盾。“长綫”是有余的物資，“短綫”是不足的物資。基本建設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材料和設備，常常是发展不平衡的，有的增长得快些，有的增长得慢些。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的建設規模，对“长綫”物資來說，已經留有很大的余地，但对于“短綫”物資來說，却存在着相当的“缺口”。怎么办呢？我們的經驗是：第一，应当尽最大可能，千方百計地增加“短綫”物資，包括提高这些物資的产量、发展确实可用的代用材料、增加这些物資的进口等等。第二，在尽量拉长“短綫”的基础上，在正确地估計到这些物資增产潜力的基础上，应当按照这些物資增产的客观可能性和现实性，来安排建設的規模，不应当再留下“缺口”。因为任何一种建設工程，如果缺少某些重要材料，缺少某些关键性的机器設備或关键性部件，那就不可能投入生产，而只能暂时閑置起来。这是不以人們的主观意志为轉移的。

必須把上面所說的这些矛盾以及其他若干有关的矛盾都处理好了，才能真正地留有余地。

三

要很好地处理这些矛盾，必須从思想認識、計划安排、規章制度三个方面进行努力，采取措施。

首先要解决思想認識問題。对于既鼓足干劲，又留有余地的方針，要反复讲，到处讲，把道理讲透。仅仅讲还不够，还要通过各項矛盾的处理，各項問題的解决，結合实践来进一步提高对这一方針的認識。处理矛盾、解决問題的过程，同时也是提高思想認識的过程。处理需要与可能的矛盾，执行“有多少錢办多少事”的方針，这就意味着要下决心推迟或者减掉一部分不可能兴办的、非急需的項目。解决局部与整体的矛盾，实行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則，就意味着要把某些从本地区、本部門看来很需要而从全局看来应当推迟的項目，坚决加以推迟。处理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矛盾，就意味着为了首先保证简单再生产，要把扩大再生产的規模限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如此等等。总之，必須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必須有所舍，才能有所取。

第二是計划安排問題。社会主义的一切經济活动都要服从国家計划的指导。既鼓足干劲、又留有余地的原則首先要体现在計划之中。計划的安排，要估計到一切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要对需要与可能、重点与一般、生产与基建等等，进行全面的綜合平衡。在財力和物力的分配計划当中，既要留下当年的預备費和机动物資，又要列入增加长期后



备的资金和物资。劳动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常常是难以预料的创造力。在计划执行过程中，经过努力，生产和收入比原定计划超过一些，是一种常见的、正常的现象。对于计划执行过程中超产超收的物资和收入，不要在沒有把握的时候过早地安排和使用，应当等到下半年，一部分超产超收已经实现，另一部分超产超收也确有把握的时候，再安排和使用。超产超收的部分，不要在当年全部用掉，应当留出一个适当的部分，用来扩大国家的长期后备。

第三是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是方针政策的具体化，是实现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首先注意从思想上和计划安排上解决问题，固然十分重要，规章制度上的“硬杠子”也是不可缺少的。比如，收支平衡而不出逆差，留有余地而不留“缺口”，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而不能拉长战线，等等原则，都要尽可能规定适当的制度和必要的纪律来保证和适应它。如果有人单纯从局部的需要出发，在计划安排时先把一般性的“软”项目站上队，在执行中再追加必不可少的“硬”项目；或者在年初安排建设项目时，先提一个较小的投资数，争取先“上马”，留下一部分投资到执行中再要求追加；或者把本年已经安排但实际无法动工的建设项目投资保留下来不交回，而又要求追加其他新的建设投资等等，对于这样一些不恰当的做法，应当从制度上加以防止和限制，使它的发生成为不可能。

总之，规章制度要促使计划的安排和执行能够比较地符合客观规律，要力求限制计

划安排和执行中的主观随意性。这样，才能使既鼓足干劲、又留有余地的方针更好地实现。

四

留有余地的方针，必须正确地执行，防止和反对保守主义的偏向。

正确地留有余地，必须是了解情况、心中有数地留有余地；必须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留有余地；必须是以鼓足干劲为基础，有利于发挥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留有余地。反之，如果不对客观情况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不从实际情况出发，心中无数，情况不明；如果把生产和收入的指标订得过小，把开支和消耗的定额订得过宽；如果不按统一的计划和国家的制度办事，层层留余地，处处留余地，势必要分散国家的财力和物力，影响国家建设的速度。这是应当坚决防止和避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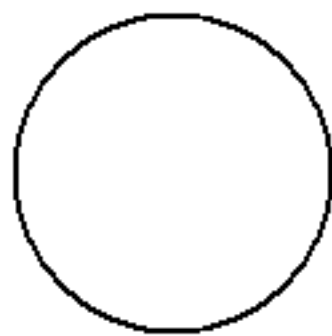
在财力、物力的分配上留有多大的余地，应当有一个适当的界限。这个界限，从原则上说，就是兼顾当年建设的需要与建立长期后备的需要，兼顾当年一般正常需要与当年临时的意外需要。如果对建立长期后备和应付临时意外需要的部分安排过少，余地留得不足，就会使我们在发生某些意外情况时陷入被动，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反之，如果对当年正常需要的建设资金和物资安排过少，余地留得过大，就会人为地减缩生产建设的规模，把一些本来能够兴办的事情延搁下来，同样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的发展。余地过小或过大都是不好的。

为了使留有余地的“火候”恰如其分，应当不断地总结經驗，规定若干具体的政策界限。例如，每年国家預算中应当留有百分之几的預备費，物资分配上应当留有多大比例的預备物资；每年的財政支出和可分配物资中，应当有多大比例用于增加长期儲备，其

中生产资料占多大比例，消费资料占多大比例等等。当然，这样一些比例数字不是一成不变的，过一个时期，情况变化了，比例数字也要变化。在同一时期內，各年的农业丰歉不同，生产发展速度不同，用于增加后备的比例也应当有所不同。在这里，做好长期规划，做到瞻前顾后，是很重要的。



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

· 許 辛 学 ·

最近，讀了有关上海嘉丰紡織厂的一个材料，是叙述他們怎样正确处理增产节约运动中所发生的矛盾的。觉得很有启发。

这个工厂，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有一个时期，遇到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增加产品的产量。在这时候，有的干部提出，采取加快机器的轉速的办法，来增加生产。但是，这样做，可能引起产品质量的下降，也可能使原料、材料的消耗增加，使設備损坏。就是說，当时在增加产量同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之間，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面对这种情况，这个工厂的领导干部认为，不能貿然采取这种办法。他們提出的办法是：必須要保证质量，在保证质量的前提

下，努力增产节约。于是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員深入車間，同工人一起，进行研究，并且派人到兄弟厂参观学习，找寻既增产又优质、消耗又少的途径。下了这一番功夫以后，他們决定改善設備状况，练好基本功，并且先在重点机台上試驗，取得經驗，然后采取稳步地加快車速的办法。这种办法很有效。結果，既增加了产量，又保证了质量，原料、材料的消耗也沒有增多，反而节约了許多，設備的状况也很好。

又有一个时期，这个工厂在增产节约运动中遇到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提高产品的质量。这时候，有的干部想用降低梳棉机車速的办法，来提高产品的质量。而根据本厂的



毛泽东同志說：“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經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經濟落后的穷国”。^①坚持从我国今天的实际情况出发，更好地安排經濟計劃，更恰当地分配我国的人力、財力、物力，是加快我国建設速度的重要条件。

目前，我国各个战綫上都是一片大好形

势。我們相信，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勤儉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我国的建設事业一定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頁。

具体条件，如果采取这种办法，不但会加大前后工序設備不平衡的矛盾，影响后道工序生产能力的發揮，减少产量，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費，而且会丢掉多年积累起来的一套宝贵的技术管理的經驗，打乱生产管理的正常秩序。这就是說，当时在提高质量同增加产量、节省人力、物力之間又产生着新的矛盾。针对这种情况，厂的领导认为，产品的质量必須提高，但是，应当在不降低車速、不减少产量、不浪費原料、不增加劳动力、保持生产管理工作的正常秩序的条件下进行。因此，他們沒有采納这种降低車速、提高质量的意見，而决定用“三結合”的办法，改进工艺設計、加强設備維修，提高操作水平。通过对梳棉机进行几十种不同車速、不同工艺、不同机械条件的測定，終于找到了符合多快好省要求的梳棉机的車速。結果，車速沒有降低，产量沒有减少，原料、材料沒有多費，人工也沒有增加，而产品的质量却提到了更高的水平。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到，嘉丰紡織厂在处理两个时期产量和质量的矛盾中，都是按照

全面地貫徹执行多快好省的原則办事的。

若問嘉丰紡織厂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是怎样全面地实现多快好省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发动群众，科学实验，实事求是，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

嘉丰紡織厂所提出和解决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人們經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強調增加产品产量或者強調降低产品成本的时候，往往容易忽視提高产品质量；在強調提高产品质量的时候，又往往容易忽視增加产品产量或者忽視降低产品成本。也有的时候，要增加产品产量或者降低产品成本，就难以提高产品质量，甚至不能保证产品质量；或者相反，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难以增加产品产量，降低产品成本。

这样的矛盾，怎样解决呢？

解决这种矛盾，必須紧紧地抓住保证产品质量、提高产品质量这个中心环节。

工业产品的质量，是指工业产品适合一定的用途，滿足国民經济一定的需要的属



性。不具备满足一定需要的属性的产品，是没有效用的，或者是效用很低的。因此，当增加产品产量、降低产品成本，同保证产品质量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防止和克服降低质量的倾向。也就是说，要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地处理多快好省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里所说的质量第一，是同“质量唯一”的那种片面思想根本不同的。质量第一，并不是不惜工本地去追求那种脱离实际的质量标准。

增产节约运动，是一个全面地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的运动，当我们抓增产工作或者抓节约工作的时候，要加倍地注意保证产品质量和提高产品质量。当然，我们抓提高产品质量工作的时候，也要认真地注意增产和节约。

没有质量，谈不上数量，也谈不上节约。只有在产品质量完全符合标准的条件下，生产才能够正常地进行，才能够真正地增加产量，才能够真正地节约。

质量的提高，不但在实际上等于增加了产量，而且会节约原料、材料，节约人力。比如，同样的电灯泡，质量好的同质量差的相比，一个可以顶两个用。而制造电灯泡所用的原料、材料，所费的劳动时间，大体上却是相等的。

在某一个时候，针对着当时的具体情况，工作的重点，可能是提高产品质量，也可能是增加产品产量，或者是降低产品成本。一般

说来，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当产品的质量还达不到规定的标准，或者还不能保证产品质量稳定的时候，我们的主要任务，应当是集中力量，努力提高质量，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求数量，求节约。当产品的质量已经达到标准并且相当稳定的时候，我们的任务主要的应当是，在严格保证质量的条件下，努力求数量，求节约。但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片面地追求一个方面，都不能忽视提高质量。

如果增产节约同提高产品质量发生了矛盾，怎样处理呢？

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对有关的各个方面，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对于产生这种矛盾的各种原因，进行客观的分析，发现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提出解决矛盾的办法。解决矛盾的办法，要经过反复地科学实验，肯定成绩，改正错误，使自己的措施符合于客观实际。这些办法，必须是在保证产品质量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全面地求得多快好省，而不是相反。

有人说，处理这种矛盾困难太多，很不容易处理得好。

我们说，困难固然有，但是，困难是完全能够克服的。关键就看你能不能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切实地解决问题，就看你能不能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嘉丰纺织厂已经提供了一个正确处理这种矛盾的好例子。别的企业为什么就不能正确处理这种矛盾呢？



美帝国主义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石油资源的最大掠夺者

施 經 綜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是世界上重要的石油产地。自从帝国主义在这个地区开采石油资源以来，丰富的石油资源成了帝国主义掠夺最大限度利润的源泉，而留给这个地区人民的却是日益加深的贫困与苦难。随着石油在国民经济中作用的扩大，它作为战略物资的重要性的增长，特别是由于攫取了石油就意味着攫取了巨大的利润，帝国主义对亚非拉美地区的石油掠夺便愈益带有疯狂性。美帝国主义，在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激烈的厮杀中，对亚非拉美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侵略扩张中，发展成了亚非拉美地区最大的石油掠夺者。美帝国主义对亚非拉美地区石油的横暴掠夺，充分地暴露了它的新殖民主义者的凶残面貌，也充分证明了美帝国主义是当今最大的国际剥削者这个无可掩盖的事实。

千八百万吨，占资本主义世界的百分之八十四，其中又以亚洲所占比重最大，占资本主义世界的百分之七十一·二（西亚地区占百分之六十七·二），拉美占百分之八点九，非洲占百分之三点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美地区的原油产量不断增加。这个地区的原油产量，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比重也显著提高，由一九四八年的百分之三十六·二，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百分之六十·三。

亚非拉美地区的原油出口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日趋重要。世界的原油出口，来自亚非拉美的比重，由战前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六十八，增加到一九六一年的一百零三。亚非拉美地区越来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石油的主要供应基地。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和日本等国进口的原油绝大部分来自亚非拉美地区，它们的进口原油占国内消费量的百分比是：英国为百分之九十九·七，法国为百分之九十五，西德为百分之七十，意大利为百分之九十四，日本为百分之九十八·五。

长期以来，美国是大量输出石油的国家。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亚非拉美地区的石油资源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九六二年，这个地区已探明的原油储量为三百二十六亿六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石油的净进口量才大量增加，到一九六三年已达九千六百八十五万吨，其中约有百分之七十来自亚非拉美地区。美帝国主义是目前帝国主义国家中进口石油数量最多的国家，美国国内目前消费的石油有百分之二十点一需要依赖进口。

战后美帝国主义加深对亚非拉美地区石油的掠夺，并不像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所喧嚷的那样，是由于美国石油资源日益“枯竭”，恰恰相反，美国已探明的原油储量，一九六二年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美国垄断资本加强对亚非拉美地区石油的掠夺，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是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所决定的。

首先，美帝国主义为了加紧扩军备战，需要在国内封闭一部分油井作为战略储备。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专家华莱士·普拉特就主张限制国内的原油产量，鼓励由西亚输入原油。他甚至主张保存美帝国主义控制的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以防在战时无法利用西亚石油。《纽约时报》也公开承认：“美国国防部的首脑们也是如此想法，他们着眼于委内瑞拉和它的石油在战略上对于维护美国安全的重要性”。

其次，亚非拉美地区的石油生产成本低、利润高，一些在亚非拉美地区占有油田的美国垄断组织，便竭力多开采亚非拉美的石油，以榨取更多的利润。

再次，美帝国主义需要通过对于亚非拉美

地区石油资源的掠夺去加强它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石油市场的控制。

美帝国主义成为亚非拉美地区最大的石油掠夺者，经历了一个野蛮地兼并扩张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美国垄断资本利用种种手段霸占了这个地区许多国家的大片领土和石油资源，残酷地进行掠夺和剥削的过程；同时，也是美国垄断资本不断排挤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利益的尖锐斗争的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帝国主义除了在墨西哥占有石油产地之外，在国外没有任何油田。一九一〇年，美国在除美国之外的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原油生产中只占百分之零点八。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石油垄断组织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很快地对英国和英荷资本所控制的石油公司进行了猛烈的进攻。在美国垄断组织方面领导这场进攻的，是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当时的董事长贝德福。^{*}贝德福用简短的一句话说明了进攻的办法，他说：“现在所需要的唯一措施，就是美国的侵略的对外政策”。美国国务院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十六日的一项备忘录中，提醒它的工作人员说：“为了美国当前和将来的需要而取得充分石油资源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了国务院的重要

^{*} 美国垄断资本掠夺亚非拉美地区石油资源的公司，最大的有五家，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是其中之一，其他四家是：纽约美孚飞马牌石油公司（以上两家公司属洛克菲勒财团），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属洛克菲勒财团和芝加哥财团），得克萨斯公司（又称德士古，属洛克菲勒财团和摩根财团），海湾石油公司（属梅隆财团）。



視。現在許多國家的國民正在全世界各地全力以赴地開采已被探明的油田并勘探新的油田，正在積極地尋求石油租借地。我們必須有關於這種活動的最完整和及時的情報……我們還指出你們對正在搜尋租借地或租讓權的可靠和負責的美國公民或企業給以一切合法的幫助。”

一九二二年，委內瑞拉的巴魯索第二號油井投入生產，日產原油十萬桶，這就使帝國主義在國外掠奪石油的注意力從墨西哥引到委內瑞拉。但是，當時委內瑞拉的石油生產處於英荷殼牌石油公司的絕對控制之下，美國的新澤西美孚、印第安納美孚和海灣石油公司利用了委內瑞拉的戈麥斯貪污政權，掠奪了豐富的石油租讓地。到一九二九年，美帝國主義在委內瑞拉原油總產量中已經占到百分之五十四，超過了英荷殼牌石油公司。到一九五六年，在委內瑞拉的全部外國石油公司的租讓地中，美國公司占了四分之三，在石油開采量方面，一九五八年美國公司占百分之七十二。

現在，美帝國主義不僅在拉丁美洲最大的產油國委內瑞拉居于石油壟斷地位，而且在阿根廷的十五萬平方公里的外國壟斷資本控制的石油租讓地中，占了十二萬平方公里。在哥倫比亞，美國控制了百分之八十五的石油開采業。在秘魯，美國的国际石油公司壟斷了秘魯百分之八十的原油生產。就整個拉丁美洲而言，美帝國主義一九六〇年初控制了全部原油儲量的百分之六十。在一九五九年控制了開采量的百分之五十七。美帝國主

義是拉丁美洲石油資源的最大掠奪者。

一九二七年，美國石油壟斷資本開始打進西亞。在這以前，西亞石油產地完全處在英國控制之下，美國壟斷資本在西亞沒有任何石油產地。一九二七年，伊拉克發現了大油田，次年，美國壟斷資本就打進伊拉克，新澤西美孚和紐約美孚飛馬牌石油公司一共取得了伊拉克石油公司百分之二十三點七五的股份。

一九二九年，加利福尼亞美孚石油公司打進位於波斯灣上的英國的保護國巴林島，幾年後，得克薩斯石油公司也進入巴林島，從此這兩家美國石油公司就平分了巴林島的全部租讓地和石油開采權。

一九三三年，加利福尼亞美孚石油公司出了一筆巨款給沙特阿拉伯國王伊本·沙特，於是取得了一項為期六十六年的租借地，後來得克薩斯、新澤西美孚和紐約美孚相繼進入沙特阿拉伯組成阿美石油公司，控制了沙特阿拉伯全部石油資源。

在科威特，埋藏着的石油比全部南北美洲還要多，是目前世界上原油儲量最多的地方。科威特原來是英國控制的，海灣石油公司在美國政府幫助下，於一九三四年進入科威特，同英伊石油公司（後改稱英國石油公司）組成科威特石油公司，控制了科威特全部石油資源，海灣石油公司取得了科威特石油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權。

伊朗的石油，在一九五一年伊朗石油工業國有化以前，全部由英國資本所獨占，一九五四年伊朗石油工業國有化運動在美、英



帝国主义干涉下失败后，以美、英为首的石油垄断资本组成的国际石油财团接管了原由英伊石油公司控制的财产，美国石油公司占了百分之四十的股份。这样美国垄断资本就插进了世界第六大产油国的伊朗。

在整个西亚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石油公司控制了原油储量的百分之十二（一九三九年）和开采量的百分之十三点一（一九三七年），而到一九五九年，这个比例已分别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三点七和百分之五十五点二。由于西亚的石油资源占了亚洲的绝大部分，所以美帝国主义既是西亚也是亚洲石油的最大掠夺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帝国主义在非洲几乎没有任何石油租借地和开采权，二次大战期间，它利用老殖民主义者地位的削弱，乘机渗入非洲。二次大战后，美国在非洲的投资迅速增长，一九六二年，已达十二亿四千六百万美元，其中约有一三分之一投在北非，在全部北非投资中，有百分之九十二点四是石油投资。

一九五六年，在阿尔及利亚境内的撒哈拉发现了艾杰勒大油田，美国同法国之间争夺撒哈拉的斗争就激烈起来。到目前为止，虽然阿尔及利亚的油田及石油开采主要仍控制在法国石油公司手中，但以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为首的八家美国公司在阿尔及利亚撒哈拉地区取得了大片租借地，租借地面积仅次于法国，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中居第二位。

一九五九年，美国的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埃索美孚石油公司在利比亚的泽

尔登找到了大油田。目前在利比亚取得租借权的二十一家外国石油公司中，美国就占了十四家。利比亚的原油产量，一九六三年末开始超过阿尔及利亚成为非洲最大的产油国。一九六四年上半年，利比亚原油产量已经相当于阿尔及利亚原油产量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八，占非洲原油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二。利比亚的原油产量的百分之九十，被美国的埃索美孚石油公司和绿洲石油集团所控制，另外，美国在非洲的其他产油国还控制着许多石油资源，所以总的来说，美帝国主义在非洲控制的租借地和掠夺的原油产量，目前已经超过法国，成为非洲石油资源的最大掠夺者。

美国石油垄断组织在亚非拉美地区的租借地的面积，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中是最多的，一九五七年已达五百一十九万三千八百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目前领土的百分之五十五点四，超过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亚非拉美地区占有的租借地面积的总和。根据美国的石油公司在亚非拉美地区各产油国所占的股份计算，一九六三年一年内，美国的石油公司在亚非拉美地区直接掠夺开采了约有三亿六千万吨原油，这是一个巨大数字，它相当于一九六二年美国国内的原油产量，它等于亚非拉美地区当年原油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三。美国石油垄断组织在亚非拉美地区霸占的租借地相当于半个多美国的领土，在这些领土上，美帝国主义组成了自己的石油王国，美国石油垄断组织这种不断扩大租借地的办法，实质上是美帝国主义用新殖民主义



手段对外扩张领土推行侵略政策的一种重要方式，铁一般的事实，粉碎了帝国主义代言人宣扬的所谓美国没有什么殖民地因而也就没有殖民利益的骗人的鬼话。

二

美帝国主义从掠夺亚非拉美的石油中榨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美国国外石油投资的利润，是美国垄断资本国外利润的最重要的源泉。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被大大缩小了的数字，一九六二年美国垄断资本从国外榨取来的石油利润即达十七亿一千六百万美元，占当年美国国外私人直接投资净利四十二亿四千五百万美元的百分之四十四点四。在美国全部国外石油投资利润中，亚非拉美地区占百分之八十三。

从主要石油公司的利润来看，更是惊人。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六三年，美国五大石油公司的净利如下：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一百三十一亿六千万美元；海湾石油公司四十六亿二千三百万美元；得克萨斯石油公司五十六亿二千九百万美元；纽约美孚飞马牌石油公司四十一亿一千二百万美元；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四十八亿美元。仅在一九六三年一年之内，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净利就高达十亿美元以上。这五家大的石油公司的利润总额中约有百分之四十八到百分之六十六系来自国外的子公司，五家大石油公司占美国二十五家大公司国外利润总额的比重高达百分之六十九。

美国的五家最大石油公司同英国石油公司和英荷合资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七家石油公司，他们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石油市场的国际卡特尔，号称“七姐妹”。一九六〇年，“七姐妹”的净收入达到二十五亿三千一百万美元，但美国的五家石油公司占了百分之七十三点五，其中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一家的净收入就超过了英国石油公司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净收入的总和。

美国石油工业国外投资的利润率，一般都大大超过国内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一九六二年，美国石油公司在国内的投资利润率为百分之八点八，而它的国外石油公司的投资利润率为百分之十四点六。这还是就平均水平而言。在西亚地区，投资利润率更高。这一年，美国在西亚地区石油工业中投资总额累计共达十一亿四千八百万美元，而当年从西亚获得的净利为八亿四千五百万美元，利润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三。按成本计算的利润率则更骇人听闻。例如，在科威特，原油的成本每桶不过零点二美元，而它的卖价却高达两美元，成本利润率高达百分之九百。据一九五七年美国大通银行的调查报告，一九五五年西亚地区原油售价是每吨十四点四美元，而成本只有一点八——二点五美元，即每吨获利十一点九——十二点六美元，成本利润率高达百分之六百六十。难怪美国《新闻周刊》沾沾自喜地说过，在中东，“对外投资的利润就好像是《天方夜谈》中的数字”。

美国在亚非拉美石油工业投资的超额利



潤，喂肥了美国石油垄断資本。在美国一百家最大的非金融企业中，有十五家是石油公司，一九六〇年底，这十五家石油公司的资产总额达到三百七十二亿美元，占上述一百家最大企业资产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其中五家最大的石油公司所拥有的资产高达二百五十七亿美元，占一百家最大企业资产总额的百分之十五。到一九六二年，仅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一家的资产就高达一百一十五亿美元，居美国五百家大公司的首位，也是資本主义世界所有公司的首位。

美帝国主义从亚非拉美地区产油国家掠夺的巨额利潤，是建筑在对这些国家石油工人的残酷剝削的基础上的。在委内瑞拉，一个石油工人，每小时生产七十一个波利瓦的价值，但每小时只能得到六个波利瓦的工资。如果說，美国石油垄断資本在国内每年从一个石油工人身上要剝削四千五百美元的話，那末，以美国为首的石油公司，每年从委内瑞拉的每一个石油工人身上榨取的淨利高达二万一千八百美元。在科威特，石油工人遭受剝削的程度更是惊人，每一个科威特石油工人每年要为美国石油公司提供四万美元的利潤。

这些国家的石油工人不仅工資低，而且工作条件差，工作時間长，經常遭到失业的威胁。例如，在沙特阿拉伯，石油工人工作時間长达十六至十八小时，但所得的工資仅等于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国石油工人工資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在伊朗，全部石油工人所得工資只等于美英为首的国际石油財团所

得利潤的四十分之一。在科威特，工人的实际工資只及美国工人的十八分之一。許多石油工人实际上过着半饥饿的奴隶般的生活，居住条件极差，疾病流行。但这些国家石油工人的苦难还远不止于此。近年来，随着帝国主义在石油工业中采用新技术，失业的阴影籠罩在亚非拉美地区主要产油国家的石油工人的头上。一九四七年，委内瑞拉石油工人有六万四千人，目前工人人数下降到三万五千人，减少了近四万人。在沙特阿拉伯，一九五五年石油职工有二万人，一九六〇年减少到一万四千八百三十四人，比一九五五年减少了四分之一。

美帝国主义在亚非拉美地区掠夺性的开采石油，加深了这些产油国家的国民經济的畸形发展。例如，委内瑞拉过去是一个农牧业产品能够自給的国家，自从帝国主义在那里开采石油以来，国民經济起了重大变化，出口的产品百分之九十九是石油，农业生产日益衰落，目前不仅每年从美国进口大量的粮食，而且連蔬菜、土豆和牛奶都要从美国进口。至于这些国家的民族工业，則根本得不到发展，帝国主义反对这些国家建立自己的采油工业，很多国家廉价出口原油，可是却要高价进口石油产品。

由于經济的单一发展，使产油国家的財政收入依賴石油的程度很大，石油收入成了产油国家財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委内瑞拉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科威特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九十，沙特阿拉伯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五，伊拉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



·伊朗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来自石油。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涨落、石油产量的升降、石油公司与产油国利润分成比例的变化，甚至石油公司造会计假账方法的改变，也都会影响到产油国的财政收入。而这些因素恰恰都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石油垄断组织控制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石油生产，也就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进而能够从各方面来干涉和控制产油国的经济和政治。

三

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各国为争夺亚非拉美地区的石油进行了紧张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斗争更加尖锐化，其中美、英两国之间的斗争规模最大和最为激烈。美国参议院国防计划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曾公开提出，美国在战争期间以“本国资源供给盟国以战争所必需的全部石油”，因此，在战后“向盟国、特别是向英国提出要以勘探出来的国外资源来补偿美国，那是很公平的”。

为了支持美国垄断组织的对外扩张，还在一九四三年，美国政府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国家机构“石油储备公司”，替美国石油公司在世界各地猎取石油租借地，排挤英国的势力。中东是美英石油资本争夺的焦点，因为这个地区石油资源最丰富，而且在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像杜勒斯曾经野心毕露描绘的那样：“自由世界中

许多国家的经济直接依赖于中东的天然物产和经过中东地区的交通。而且，间接说来，自由世界的全部经济都是与中东攸切相关的”。在殖民利益的驱使下，美、英帝国主义为着排挤竞争对手，除了通过扩大投资、控制石油运输管和加强“援助”等方式来夺取势力范围而外，还采取了破坏、暗杀和军事政变等最卑鄙的手段。美、英帝国主义的这些斗争都带有强烈的石油气味。美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中东的控制权，甚至支持以色列同阿拉伯联盟进行公开的武装冲突，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进一步成为美帝国主义在中东推行侵略扩张和排挤英国势力的工具。

美、英帝国主义争夺中东石油的最激烈的斗争，是对伊朗石油控制权的争夺。一九五一年以前，伊朗石油全部控制在英国的英伊石油公司手中。一九五一年三月，伊朗政府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宣布实行石油国有化，从这一天起，美国从外交官到当时的总统杜鲁门都公开出面进行了紧张的活动，企图夺取伊朗的石油控制权、取代英国的地位。英国工党议员克罗斯曼当时惊呼：“美国传统上的石油政策如此严重地损害着英国的民族利益”。英国《泰晤士报》也抨击说：“美国的石油利益同英镑区石油是互不相容的”。这场斗争的结果，英国在伊朗的石油独占地位被打破了，美国石油垄断资本取得了伊朗百分之四十的石油控制权。

一九五六年，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地区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美国石油资本竭力想插足进去，美、法之间争夺撒哈拉地区石



油资源的斗争激烈起来。但由于法国垄断资本的严密控制，直到一九五九年美国在撒哈拉的投资还只占全部外国投资的百分之六点五，法国资本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美国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等公开要求美国政府进行干涉以扩大在这个地区的投资和勘探面积，而法国垄断资本对此并不让步。美国垄断资本在夺取撒哈拉石油资源的计划遭到抵制以后，便采取种种手段来挖法国垄断资本的墙脚，从而进一步加深了美法之间的矛盾。

一九五六年，英法帝国主义侵略埃及失败后，美国乘机排挤英法势力，企图独揽中东的石油利益，夺取对中东的控制权。当时，美帝国主义排挤英法帝国主义势力的重要一着，就是以“援助”为诱饵，以武力威胁为手段，推行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艾森豪威尔在致美国国会的特别咨文中毫不掩饰地说明美国实行这一新扩张的目标之一，是中东“那里的石油蕴藏量占已发现的世界蕴藏量三分之二左右”。美国在中东排挤西欧老殖民主义的行径遭到英法帝国主义的不满和抵制。一个名叫特里布列的法国部长愤怒地指责美国的目的是：“英法滚蛋，让我一个人来！”英国工党已故的领导人之一比万当时也心酸地说：“在英国在军事上或在经济上表现出太软的地方，美国的势力就接受过去”。

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对帝国主义争夺石油的斗争作了如下的论断，他说：“现在世界列强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石油问题。……拿全世界两大石油公司——代表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和代表英国的‘英荷壳牌石油公

司’——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公司在全世界一切出产石油的地方都在进行斗争。这是美英两国之间的斗争。因为石油问题是生命攸关的问题”。^①斯大林的这一论述对分析战后帝国主义争夺石油的斗争，仍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帝国主义为争夺石油而进行的斗争，使许多产油国家的政治局势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持和扩大对石油的垄断，经常使用金钱收买、暗杀和颠覆破坏等等手段在产油国扶植美国石油垄断资本的代理人，以执行有利于美国石油垄断资本的政策。

早在二十世纪初，为了争夺墨西哥的石油，美帝国主义就在墨西哥不断地搞颠覆活动。一九〇一年，墨西哥总统迪亚斯给了美国人在墨西哥开采石油权，后来又给了英国石油开采权，于是美国同英国就为掠夺墨西哥的石油而展开了斗争。美国首先通过贷款和供应武器策动迪亚斯的对手马德罗制造政变，结果马德罗取胜并于一九一一年就任总统。英国不甘心失败，又利用墨西哥的威尔逊将军进行政变，一九一三年二月在墨西哥街上展开了激烈的浴血战，马德罗被捕并遭杀害，威尔逊就任总统。不久以后，美国又援助墨西哥的卡兰萨将军推翻了威尔逊政权，卡兰萨当了总统。卡兰萨为了保护墨西哥的权益，于一九一四年建议通过立法程序

^①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0页。



确立国家对地下矿藏的所有权，一九一八年他接收了維拉克魯斯北部的油井，这样就妨碍了美国石油公司的利益，美国石油公司在一九二〇年收买沃普雷孔將軍，暗杀了卡兰薩总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为了石油公司的利益，在巴西也一再搞顛覆活动。一九五三年，巴西总统赫士略·瓦加斯頒布法令，申明只有巴西人有权开发本国石油和在巴西开设炼油厂，一九五四年初，巴西正式成立“巴西石油公司”，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石油国有化运动。这就引起了美国垄断资本的极大不满，在美帝国主义的壓力下，瓦加斯总统被迫辞职后自杀。前不久，在巴西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古拉特政府加紧石油国有化的步伐，下令征收私营炼油厂，直接触犯了美帝国主义的利益，美帝国主义就策动巴西反动派进行政变，顛覆了古拉特政府。

在中东，美英帝国主义为了争夺石油利益，不断地制造暗杀和政变事件，造成中东局势长期动荡不安。例如，亲英的約旦国王阿布杜拉和伊朗首相拉茲馬拉都是被美帝国主义暗杀了的。在叙利亞，单是一九四九年一年中就发生了三次政变。一九四九年三月，泽伊姆上校在美国支持下通过政变上台，宣布同美国阿拉伯石油公司签订的油管过境合同生效，八月，亲英的兴那維上校又发动政变，废除了同美国的油管过境合同，到十二月，施舍克里中校再次发动政变，重新宣布油管过境合同生效。

在伊朗，美国利用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来排挤英国之后，一九五三年八月，美国又反过来同英国勾結，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反动的陆軍顛覆了执行石油工业国有化政策的摩薩台政府，镇压了石油工业国有化运动，扶植原納粹分子、后来变成美国走狗的薩希迪上台，为美国后来插足于伊朗石油业創造了条件。一九五七年，洛克菲勒給艾森豪威尔的秘密报告中就赤裸裸地說道：“我們终于能够取得伊朗石油，并且我們現在在这个国家的經濟中地位已經相当巩固。我們在伊朗的經濟地位的加强使我們能够控制它的整个外交政策，并且特别是使它参加了巴格达条約。目前，国王沙阿未經征求我們的大使的意見甚至不敢更动一下他的內閣。”

除了上述种种破坏手段以外，美帝国主义还使用軍事手段来扩张和保持美国石油垄断资本的利益。美帝国主义不仅使亚非拉美的产油国家成为它的原料基地，而且使一些产油国家变成美帝国主义的軍事基地。在委內瑞拉、伊朗、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等美国石油公司掠夺大量石油的国家，美国都建立了軍事基地。例如，在沙特阿拉伯，美国的空軍基地就建立在重要的石油矿区达兰。在有些地方，美国采用了先建立軍事基地然后开采石油的手段，如一九五四年美国同利比亚签订协定租借了惠德勒斯空軍基地，一九五五年，美国四家石油公司就从利比亚取得了石油勘探权。美帝国主义除了在一些产油国建立軍事基地外，并对这些国家采取签订双边軍事协定，提供軍事“援助”，派遣軍事



代表团，训练和装备军队，拉拢亲美军人等手段，力图加强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控制。委内瑞拉、伊朗、沙特阿拉伯等产油国家的军官大都是美国训练的，使用的大都是美式装备。无论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国培植起来的当地军队，它们打的都是反共的旗帜，但真正的目的则是为了扩张与保护美国的石油企业和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

四

亚非拉美地区各国人民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掠夺石油资源进行了长期的英勇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斗争声势越来越大，斗争的方式也在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比较普遍的是为争取实行或提高利润分成的比例而斗争。在亚非拉美地区产油国家中，第一个取得石油利润对半分成的国家是委内瑞拉。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个国家的石油工人曾经举行了总罢工，总罢工得到全国学生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这是委内瑞拉人民有史以来公开反抗外国石油公司的第一个信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委内瑞拉工人阶级日益强大的压力下，美国石油垄断组织被迫与委内瑞拉政府谈判，接受了石油利润对半分成的原则。一九四三年在委内瑞拉开始执行的利润对半分成办法，从一九五〇年起逐渐扩大到西亚地区各国，在有些产油国，利润分成已超过半数以上。在实行利润分成办法以前，各个美国石油公司在产油国得到的利润高达产油国家的收入的五至十倍；实行利润分成办法以后，

美国石油公司不得不将一些利润分给产油国家，从而使产油国家增加一些收入。

但是，按照这种办法分给产油国的利润，只是帝国主义的残羹剩饭。因为石油公司的董事、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均由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员担任，产油国不能参加管理，因而公司的财务状况，例如，开采了多少原油，利润的实际数字共有多少，产油国都无法知道。所以即使实行利润分成或利润分成比例有所提高，也由于帝国主义的弄虚作假而不能给产油国带来多大好处。例如：利比亚政府与美国石油公司实行利润对半分成，但是一九六二年美国在利比亚的石油公司共获利一亿四千万美元，而利比亚政府的石油收入仅有一千九百万美元，利比亚政府的石油收入仅为当年美国在利比亚的石油公司的利润的七分之一。事实表明，在亚非拉美地区产油国人民斗争的压力下，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国际石油卡特尔不得不被迫在表面上作有限的让步，实行利润分成办法或提高利润分成比例，但是这种办法有很大欺骗性，从根本上说，它更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作为亚非拉美石油资源的掠夺者和垄断者的地位。

亚非拉美地区的产油国家，从长期同帝国主义斗争的经验中知道，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地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石油垄断组织的垄断和控制。一九五九年，在开罗召开了第一届阿拉伯石油大会，接着，大会附设的石油专家委员会开会，会议建议今后在没有阿拉伯国家分享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情况下，不再给予新的租让权，会议敦促所有成员国实行标准化的石油法，并收回租让地区中尚未开发的部分。在一九六〇年十月



第二届阿拉伯石油大会开会的前一个多月，亚非拉美地区主要石油出口国家成立了由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科威特和委内瑞拉组成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后来，卡塔尔也参加了。成立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是统一石油政策，特别是在石油价格政策方面采取一致行动，抵制帝国主义垄断石油价格。现在，产油国的联合组织的成员，已由阿拉伯国家扩大到亚非拉美地区的主要产油国家，亚非拉美地区产油国家的联合，为在更大范围内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为了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掠夺、剥削和控制，亚非拉美人民纷纷要求把美帝国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石油企业实行国有化。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墨西哥人民强烈的要求下，墨西哥首先实行了石油工业国有化。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墨西哥政府公布了国有化法令，成立了国营墨西哥石油公司，一九四〇年全面控制了墨西哥国内石油的生产和销售。墨西哥人民在美、英帝国主义破坏了油田的基础上，克服了资本短缺和美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的困难，发展了本国的石油工业，使国家的经济建设向前推进了一步。

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锡兰政府不顾美帝国主义停止“援助”的威胁，接管了美国和英国三家石油公司的全部财产、设备和业务，并将石油制品进口和销售业务全部交由锡兰石油公司经营。从此结束了许多年来外国石油公司垄断锡兰石油市场的局面。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就这件事发表的文告中指出：“除非打破外国垄断资本组织对

我们经济的控制，否则我们的政治自由就没有什么意义。”

近年来，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国保卫石油主权的斗争，在人民要求石油国有化的运动的推动下也正在向前发展。在伊朗和巴西，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石油国有化运动虽然在帝国主义的武装颠覆和破坏下，暂时遭到了挫折，但是，它有力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从反面教育了这些国家和亚非拉美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活动必须保持严重的警惕。

亚非拉美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掠夺石油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这一斗争要取得最后的胜利，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艰巨和复杂的过程。事实证明，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垄断和控制的 国家，依靠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自力更生地办好本国的石油工业。英勇的古巴人民推翻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并且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一九五九年古巴政府把地下的石油资源全部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一九六〇年又把美孚和得克萨斯两家帝国主义的石油公司的炼油厂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尽管美帝国主义疯狂地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来扼杀古巴石油工业，但是古巴人民通过对帝国主义的坚决斗争，使古巴的石油工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迈进。古巴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在古巴的石油企业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的办法，沉痛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古巴人民的英勇行为给目前仍然受到美帝国主义掠夺、剥削和控制的亚非拉美地区各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佛教思想和中国哲学思想

——讀《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論集》

孔 繁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我国以后，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曾經发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佛教哲学成为我国哲学史上重要的唯心主义思潮之一。研究中国哲学史，如果不重視对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就将难以清楚地了解中国哲学史上较长时期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发展綫索。因此，我們今天应当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加强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解放以来，虽然出版了一些有关佛教等宗教問題的著作（其中有些是解放前旧著的再版），但是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写成的著作是很少的。任继愈同志的《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論集》，可以說是近年来我国哲学界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研究批判中国佛教思想的尝试之一。論文集收集了作者的七篇論文和几篇附录。作者在这些論文中，试图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佛教哲学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及其社会政治作用；并对隋唐时期重要佛教宗派的思想体系，作了初步的剖析，对我国佛教哲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方法，例如，胡适在禪宗史研究中的謬誤，进行了批判。

作者是从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来考察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的。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經濟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认为佛教虽然是外来的宗教，但它在中国生根发展以后，便和印度的佛教不同了。从我国佛教各宗派的盛衰可以看出，凡是与中国当时社会条件相适应建立的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禪宗），就得到发展，生搬硬套的外来学說（如法相宗），就未能发生广泛的影响。我国佛教思想的变化、发展，是和过去我国社会政治、經濟关系的变化、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因此，研究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的具体历史情况，不能脱离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綫的斗争。

佛教自传入中国时起，就一直是按照中国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解释和需要来传播其宗教学說的。佛教的唯心主义与中国固有的儒家唯心主义以及老庄哲学互相补充，互相发展，共同反对唯物主义。我国哲学史上反对佛教有神論的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主要内容。

东汉时期，社会上流行的宗教迷信是道术方士的神仙方术，当时佛教传入我国，即是被統治者当作神仙方术来理解和接受的，史书上有“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的記



載。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思想與為當時門閥士族地主政治服務的玄學唯心主義結合，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與玄學唯心主義相適應，佛教大乘空宗的“般若”學說引起當時社會的重視。當時“般若”學說的一些宗派，可以在玄學中找到它們的思想聯繫，如以道安為代表的“本無”宗和以支道林為代表的“即色”宗，即相同於玄學中以王弼、何晏為代表的“貴無”思想和以向秀、郭象為代表的“崇有”思想。玄學與“般若”的唯心主義，都是追求超越客觀世界的精神性的本體。佛學以玄學唯心主義對老莊的理解來解釋“般若”思想，而玄學也借助“般若”學說來豐富發展它的唯心主義。例如，魏晉以來，玄學唯心主義關於“有”“無”、“本”“末”（即最高的精神本體與客觀物質世界以及人們表現出來的精神活動）之間的矛盾，長期在理論上不能得到圓滿解決。而佛教的學者則用“般若”空宗的思想，把客觀物質世界的存在及其運動變化都宣布為“假有”、假象，這樣做，雖然並未有真正解決“本末有無”的矛盾，但通過純粹思辨的方法彌縫了玄學唯心主義理論上的矛盾，從而發展了玄學唯心主義。

在南北朝門閥制度僵化、階級對立十分尖銳的社會條件下，佛教提倡“涅槃”佛性的學說，即通過宣揚人人都有佛性，宣揚靈魂不滅和因果報應，轉移人民對現實社會階級壓迫的鬥爭。當時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便集中在反對靈魂不滅和因果報應上。南朝齊、梁之際展開的神不滅與神滅的爭論，曾使唯物主義無神論與佛教唯心主義有

神論的鬥爭達到極其尖銳的程度。佛教提倡的神不滅論，實際是對中國傳統的宗教有神有鬼論所作的進一步的理論發揮；而范縝的神滅論思想則把中國傳統的唯物主義形神關係的學說推到新的階段，肯定了精神是物質的作用，嚴重地打擊了佛教的宗教迷信。

隋唐時期，佛教形成各個強大的宗派，佛教發展到鼎盛時期。當時佛教各宗派為了建立獨立完整的唯心主義理論，都建立了判教的體系。判教，雖然也表現了佛教內部各宗派之間的排他性，但其主要的目的仍是為了加強佛教理論戰線的防禦力量，為了反對唯物主義。判教，使佛教唯心主義更向徹底發展，如法相宗以“阿賴耶識”為宇宙的本體，把客觀物質世界說成人的意識和感覺活動的產物。這種唯心主義已經很徹底了，而華嚴宗的宗密則認為把“識”絕對化，“識”有被理解為客觀實在的嫌疑，這種唯心主義還不夠徹底。各宗派都紛紛“侈大其宗，自名一家”，競相建立瑣瑣臆造的哲學體系。它們一方面竭力粉飾“天國”的美滿幸福，宣傳人世不能與“天國”相比；另一方面又竭力從理論上縮小人世和天堂的距離，更為廉價地大量出售進入“天國”的門票。如像天台宗提倡的“無情有性”，華嚴宗提倡的“理事無礙”，法相宗提倡的“三性”、“三無性”、“轉識成智”，禪宗提倡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都力圖從理論上掏空客觀現實世界的物質內容，通過對各種哲學範疇的歪曲，通過相對主義詭辯論的方法，把認識的某一環節加以絕對地夸大，妄圖用主觀精神去吞併客觀物質



世界，把客观物质世界看成是人的幻觉、假象，使人不再去积极参加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这样便在世界观上牢固地确立起人们对于宗教的信仰。

当时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要反对佛教，是要在政治上冒很大风险的。唐初自然科学家傅奕，曾经依据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对佛教有神论进行过尖锐的抨击。唐中叶重要唯物主义哲学家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学说，否认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上有超越的神做主宰，这是从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对于包括佛教在内的一切宗教有神论的新的有力的驳斥。宋明时期兴起的“理学”和“心学”唯心主义，如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人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他们虽然排斥了佛教的宗教形式，却又继承了佛教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客观唯心主义者主张有一个超越客观物质世界的精神性的“理”为世界的本原，世界万物均是这个“理”的体现，他们宣传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就和华严宗的“理事无碍”的思想相接近。主观唯心主义者主张“心”为世界的本原，提倡神秘主义、直觉主义的“致良知”说，也即是吸收了禅宗的“顿悟”的学说。宋以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如张载、陈亮、叶适、王廷相、罗钦顺、王夫之等人，他们在反对理学唯心主义的斗争中，都指出当时的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与佛教的唯心主义有着思想上的密切联系。他们批判理学唯心主义的同时，也继续深入地批判了佛教唯心主义。

佛教思想长期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中重要的宗教观念形态，被封建统治阶级用作压迫人民的精神武器，起了麻醉人民的鸦片烟的作用。佛教唯心主义和科学是绝对不相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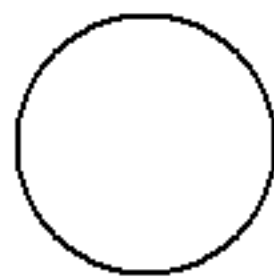
但是佛教思想也曾经在认识论的某一环节提出过某些较为深刻的哲学思想。佛教哲学一开始，就用分析感觉、概念、物质属性来论证它的宗教唯心主义体系。它的精致的烦琐的哲学体系，有时也歪曲地透露出辩证法的思想。作为思想资料，它的逻辑分析方法，它的某些朴素的辩证法观点，也还有批判吸取的价值。我国历史上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在和唯心主义斗争中，也有批判改造佛教思想来丰富自己的体系的。如张载、王夫之等在反对唯心主义超越一切的“道”或“理”时，就曾经批判吸收佛教的某些泛神论思想和某些朴素的辩证法观点，论证“道”不能脱离“器”，“理”不能脱离“事”。因为佛教哲学中包含有丰富的反面材料，所以过去凡是批判了佛教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通过对佛教思想的扬弃、改造，都曾使自己的朴素唯物主义获得新的发展。明末进步思想家李贽曾经利用禅宗提出的不信权威的口号，对封建正统思想的权威孔子的言论也提出过怀疑，发展了自己的某些思想。清末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谭嗣同，在建立他的“仁学”哲学体系时，也曾吸收佛教的某些思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章炳麟，亦曾试图把法相宗和华严宗的思想加以改造和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相揉和，来建立适应资



产阶级革命要求的哲学体系。他还把禅宗的思想概括为“自贵其心，不援鬼神”，用以鼓动人們不怕牺牲，勇于去进行革命斗争。这些情况都说明了佛教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所发生的深刻影响。

从以上佛教思想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来看，加强佛教思想史的研究是一件重要的工作。任继愈同志的论文集，对于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研究批判中国佛教思想，还刚刚开始，作者还只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因此，论文集不論在論述佛教思想在我国发展中的社会政治作用方面，或者对每一重要哲学宗派的体系的剖析及其作用的評价方面，都还存在一些缺点，例如唐初是我国統一的强盛的帝国形成的时期，也是佛教哲学发展极盛的时期，作者对佛教各宗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当时社会政治經濟所发生的作用的分析，显得不够。对于佛教哲学体系发展中产生的矛盾，如泛神論思想的滋长（在天台宗、华严宗、禅宗中都述及到）的原因，分析也不够充分。尽管对于各重要宗派思想体系的具体分析和評价，需要繼續深入研究，进一

步加以討論。但作者所坚持的研究方向，則是应当肯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解剖一切思想史（包括佛教思想史）的钥匙，离开这把钥匙，就无法探寻思想史的秘密，对某一时代的思想在当时社会所起的作用也就不能作出正确評价。历史上有不少卓越的唯物主义无神論者，他們和宗教唯心主义进行过尖銳的斗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宗教迷信，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但他們都未能找到宗教发生的真正根源，他們在历史观方面的唯心主义不可避免地給宗教思想留下活动的地盘，他們反对宗教的斗争都不能是彻底的。近代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完全从外来的偶然原因，从佛教思想本身說明佛教思想在我国的发展，这也是一种唯心史观。像这样的錯誤，我們不能再重复。我們必須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插到这一学术領域，使佛教思想史的研究为我們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佛教这种宗教迷信在今天我国的社会中仍然保留有相当的影响，研究批判佛教思想，对于宣传唯物主义无神論，克服人們思想中的宗教偏見，具有现实的意义。



坚持革命方向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演出节目观后

王朝闻

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我从彭真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报告中，从京剧艺术家所塑造的英雄人物的言行中，从艺术家们的工作和学习态度中，受到了教育和鼓舞。我所学习到的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论在艺术创造上、艺术评介和研究上，都必须经常地、一贯地、坚决地贯彻党的文艺方向。

回顾自己一九六二年夏季以前那些涉及戏曲的文章，对待传统戏曲的态度，出现过不是从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不是从群众的革命利益和政治需要出发，实际是从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出发，对于传统戏曲加以不应有的赞扬。不仅赞扬过一些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需要相抵触的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戏曲，而且一再赞扬过川剧《焚香记》、《红梅记》、昆曲《钟馗嫁妹》、京剧（以及地方戏）《伐子都》这四个鬼戏，错误地肯定过其中的鬼魂敷桂英、李慧娘、钟馗、颖考叔和他的马童在形象的塑造上以至思想内容上的意义，产生了坏的影响。

概括地说，我在鬼戏问题上发表过的错误论点，有如下几方面：我把鬼的形象的塑造，和神话、寓言的形象的塑造，在手段上和效果上都混淆起来，把这种产生于迷信思想的鬼，不仅单纯地当成想像和幻想的产物，而且还认为它有利于矛盾的集中表现，有利于深刻、透彻表达反封建的主题思想；我把鬼的形象的塑造，当成因犯罪而心中有鬼的人的心理状态的一种具体描写，当成暗杀颖考叔及马童的子都特殊心理的形象化形式，忽视这种形象的鬼的特性对观众精神上的坏作用；我没有把鬼魂报仇

当成在封建势力压迫之下的人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的表现，而认为这种死后也要复仇的鬼的形象是反封建的人的性格的发展，是由不反抗到反抗的性格的质变和飞跃。总之，是把鬼魂和人混淆起来，把所谓好鬼当成现实中的好人来加以赞扬，把台上的鬼魂当成戏剧概括生活的一种可以利用的甚至是必要的方式，这实质上是为鬼戏在过去和现在的存在，从艺术形式上甚至思想内容上，提出了为它辩护的论证，为鬼戏的继续上演制造了“理论”根据。这就表明我完全忽视了存在于这些即使是经过整理的鬼戏中的迷信观念，宿命论思想，唯心主义思想对于群众思想上的毒害，没有严肃考虑过鬼戏在社会主义时代的舞台上出现，是不是会加深和巩固群众残留的唯心主义、封建迷信、宿命论思想，是不是会引导人厌恶和逃避现实斗争，是不是会阻碍群众思想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严重错误的产生，是我严重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政治、脱离斗争的结果。

在无产阶级的尖锐斗争中，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复杂的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革命形势之下，在群众要求进一步革命化和进行自我改造的革命形势之下，对于艺术家和评论工作者来说，一切文艺现象都必须摆在当前整个的斗争形势和革命任务之下来理解，必须警惕地对待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包括有些人想利用鬼戏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即令是对待某些在封建社会中曾经起过一定积极作用的传统剧目，也不能不管历史条件，不根据当前的革命形势，严肃对



待；认真分析它在社会主义时代可能引起什么作用，认识它究竟是有利于革命还是不利于革命，它究竟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起巩固和发展的作用还是相反，这都是在评介包括传统戏曲的艺术时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而我自己，却把鬼戏当好戏来称赞，支持了不利于革命的鬼戏，根本违反了革命的文艺评论工作的政治方向，损害了党和人民的革命利益。

这次京剧现代戏会演，特别是党关于坚持文艺的革命方向的指示，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也鼓舞了我彻底进行自我改造的信心和决心。大会教育了我。为了把社会主义新戏曲推向更高的高峰，为了京剧现代戏和其他革命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为了革命的艺术创作与革命的艺术评论在正确方向下的并肩前进，为了在艺术领域中战胜一切敌对思想的进攻，艺术创作、评论工作、研究工作都必须把坚持革命方向放在头等重要地位。在这里，我把参观京剧现代戏演出的一些体会，特别是它坚持党的革命文艺方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分四点加以表述。

革命的艺术

革命的京剧现代戏，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产物。京剧经过革命的变革，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工农兵的革命艺术，成为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的有力武器。我所看到的京剧现代戏，其内容和形式都有不能互相代替的优点，也有不能混同的特点，却都一致地在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使京剧艺术起了质的变化。在反映各个不同革命历史时期的生活和斗争中，都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着重点入手，歌颂工农兵群众，表现工农兵群众，代表工农兵群众的。这是这些现代戏革命化、群众化最有决定意义的标志，也是它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的决定性原因。

革命群众迫切需要的，是工农兵成为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而且显示出他们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伟大气魄的现代戏。艺术的时代性不是抽象的概念，

如果不是主要表现工农兵，京剧的时代性的表现就丧失了最重要的依据。那些歌颂帝王将相、少爷小姐的京剧，是违反工农兵的政治利益的，对群众的思想感情起腐蚀和毒害作用，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根本违背了人民群众对艺术的要求。那些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内容，以反对贪官污吏和济困扶危的英雄为主角的戏曲，虽然和工农兵利益不是绝对对立的，可是它对封建的剥削制度没有彻底加以摧毁的要求，它宣传的不是彻底革命的思想，远远落后于当代工农兵群众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所以，如果不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整理和改编，从而明确显示历史的本来面目，配合当前的革命斗争，这样的戏曲也很难适应人民群众的需要。

只有歌颂和表现当代的英雄，才最能代表工农兵，也才能更好地教育工农兵。尽管传统戏曲中也有正气凛然的民族英雄，在经受得住敌人威胁利诱的严重考验，坚持爱国主义信念而慷慨就义这一点，和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或《红灯记》里的李玉和的遭遇与态度有相近之处，但是后者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他那坚贞不屈的行为所表现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是建立在自觉的无产阶级思想基础之上的，因此，他的作用远不是旧时代的民族英雄所能企及所能代替的。以战争生活为题材，以武生为主要角色的《三打祝家庄》，和《智取威虎山》或《奇袭白虎团》相比较，前者在思想内容上就显得大为逊色。虽然这种经过改革的优秀剧目对当代群众也是有益的，但是从人物精神面貌的高度看来，混进敌人领导部门的乐和，哪里比得上混进威虎山的解放军战士杨子荣？探庄时越过重重困难的石秀，哪里比得上深入敌人腹地的志愿军战士严伟才？这是因为后者的斗争遵循党的正确领导，他们那勇敢、机智的战斗行为，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改造客观世界为目的的。

传统戏曲中的英雄，不能代替现代戏中的英雄的重要原因，也在于观众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同。新时代的英雄，是和群众生活、斗争在同时代的，奋斗目标和斗争对象都是共同的，和当代群众是同



呼吸、共命运的，所以，当他经过艺术的概括而出现在舞台上，使人感到无比亲切而受到鼓舞，成为观众愿意直接仿效的对象。

时代的英雄成为京剧的主角，关系政治思想上的教育作用，也关系艺术魅力的大小。《红灯记》所反映的生活和斗争，同我们的生活和斗争密切相关，所以，当我们看到李玉和同磨刀人将要接上秘密关系时所引起的兴奋，在心理基础上不同于看到旧戏里的好人和好人取得联系时所引起的兴奋。当我们看到李玉和同磨刀人的联系被突然到来的日寇所破坏，看到情急智生的李玉和从容不迫地把秘密文件放进饭盒，唱“打开饭盒把粥倒”时所感到的愉快，既是演员那种富于潜台词的演唱所引起的，也是观众自己对于同时代的英雄的命运和文件的关心所引起的。抒情性是京剧歌唱的特点和力量所在，也是观众自己的情感对象化的依据；但是只有当演员唱出了当代英雄一贯而又和具体矛盾冲突相结合的革命感情，观众自己的革命感情得到了相应的表现形式，表现李玉和的感情的歌唱才强烈地感动了自己，从而有力地影响了自己的思想。出现在舞台上的对象是同时代的英雄，所以当观众仿佛觉得不是演员在演唱，而体验着李玉和战胜了困难时的喜悦心情，这种演唱对观众产生了不是看见旧戏里的好人脱险时所能引起的感动，在精神上引起了看传统戏曲不能引起的影响。

在文学性较强的传统戏曲里，富于艺术魅力的双关语，不是找不到的。但是，我在《红灯记》里所听到的双关语，不论是李玉和在“赴宴”之前，接受李奶奶的送别酒时出现的双关语①，还是李玉和同鸠山舌战，辩论人生意义时出现的双关语，还是李玉和在临刑前叮嘱铁梅“……若有机缘回家转，你……与我投亲靠友到关山”这样的双关语，都是切合当代英雄的战斗生活的，是和这种斗争的时间、地点、条件分不开的，所以它的隐喻性的力量，在观众情感上所引起的激动，至少在程度上不是任何传统戏里的双关语所能匹敌的。

由此可见：京剧究竟应当主要是演今人还是演古人，究竟应当是歌颂新人还是歌颂旧人，究竟应

当为多数人服务和代表多数人，还是相反，问题是不难回答的。

革命的京剧现代戏，是代表群众对当代的现实生活“发言”的，是群众对革命事业的态度在戏曲艺术中的集中表现。任何阶级的艺术都要表现本阶级的生活和斗争，宣传本阶级的思想，借此达到自己的胜利，巩固本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戏剧也不例外。那些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利益的旧京剧，有时也描写被统治的劳动人民，可是却把他们当成无足轻重的奴才，粗鄙可笑的丑角。要是我们容忍它占领社会主义时代的舞台，就无异于是帮助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对革命进行侵蚀。党对戏曲改革的领导，代表着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利益，代表千百万群众的欣赏要求，不仅为革命的京剧艺术家指出了前进的道路，也符合他们革命的意志和愿望。因此，把舞台这一阵地夺回来，把那些对敌人有利对人民不利的旧戏赶出舞台，大力提倡革命的现代戏，是十分必要的。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它那革命性威力感到恐惧，看也没有看就破口咒骂它。但是任何咒骂都不能阻挠我们前进的步伐，只能证明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正确。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重大成就，是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的胜利。这就不仅预示了京剧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而且一定会积极影响整个戏曲和其他艺术的革命化的发展。不论是依据小说、电影改编出来的剧本，还是从别的剧种移植过来的剧本，本质上也是创造性劳动。这种创造还处于前进过程中，所以它还不是十分成熟的。如果剧本修改得更成熟些，演员再创造的才能定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不少剧目在反复研究群众反应的

① 李玉和：……妈，您保重，我走啦。

李奶奶：慢！铁梅，拿酒来。

铁梅：哎！

侯队长：酒席上有的是酒啊！

李奶奶：哼！

(念)穷人喝惯了自家酒，

点点滴滴在心头。

……



条件之下，经过反复演出和反复修改，当它在思想上艺术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一定会成为很好的保留节目。经过反复加工而提高了思想性的新作品，又会被其他剧种移植过去，在适应其他剧种的特性的条件下，使它在艺术上得到相应的丰富和提高。一切文艺现象都不是彼此孤立的；正因为观摩演出的成就是党的文艺方针的贯彻，戏剧之外的其他艺术（例如中国画），也会得到如何革命化、群众化的借鉴，使它自身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根据许多优秀剧目和优秀表演的经验看来，保证剧本或表演内容的正确性、深刻性的根本条件，保证剧本或表演形式的创造性、借鉴性的根本条件，是艺术家自身的逐步革命化，是艺术家逐步与工农兵结合，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受到革命的教育。《智取威虎山》的革命化、群众化，不仅表现在剧本思想内容上，也表现在表演形式上，这是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接受了党的领导的结果。“献图”一场戏很感人，它是按照革命群众对客观事物的是非观念和爱憎态度来处理的。仅就场面调度看来，导演不是把匪首的座位安排在传统戏曲的排朝或点将的中心，而是安排在舞台的侧面。艺术家利用了座山雕迷恋“先遣图”这些生活的具体性，把他从高位上调下来，让英雄杨子荣转到场面的“制高点”引诱对方随着自己手中的那幅图打转转，像耍猴子那样耍弄着座山雕。在观众感受上造成了这样的特点：杨子荣处于有崇高感的“仰拍”镜头似的地位，座山雕处于有卑下感的“俯拍”镜头似的地位。这就避免了正不压邪的客观主义地塑造形象的毛病。演员李仲林的表演不偏于再现杨子荣冒充土匪的邪恶的生活特征，而是力图不因为表现杨子荣化装土匪而掩盖了人民英雄的本色。在情节上关于射击技术的表演，让角色欺骗狡猾的敌人，却力图避免客观上欺骗了观众。这种和自然主义根本不同的方法，不让任何丑恶的东西掩盖了英雄的美，使观众随时都感到自己面对着可以信赖的英雄那种崇高的精神面貌，是坚持艺术革命化的具体表现之一。

要正确表现当代英雄，不仅必须掌握新时代群众发展了的审美趣味，而且自己必须首先具有革命

者的思想感情。演员李丽芳说，自己如果“不革命化，怎么能正确和深刻地表现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呢？”准备表现英雄的过程，就是向英雄学习的过程。把当代英雄演得又真又美的演员宋玉庆说过，他在《奇袭白虎团》里扮演志愿军侦察排长严伟才，开始为了突出表现人物的英雄气派，产生了不像革命战士的缺点，后来向抗美援朝的侦察兵英雄杨育才学习，学到了他那“既有平平常常，对自己同志亲切平易的一面，而当对敌斗争时，他又有机智勇敢、行动起来像生龙活虎的一面”等特点，才进一步解决了表演的真实感与京剧艺术特性的矛盾，得到观众的赞扬。许多演员成功的表演证明：艺术家的工农兵化不仅是为了利用戏曲形式在形象上把工农兵表现得既真且美，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给这种神圣的劳动创造最根本的条件，保证在思想上正确认识所要再现的对象，在情感上深刻感受所要再现的对象。

艺术的革新

京剧艺术家在一定程度上和工农兵相结合，不仅使京剧的内容革命化了，而且使京剧的形式也丰富和发展了。

京剧现代戏不能脱离京剧艺术，同时却必须是京剧艺术的革新。从崭新的创作任务出发而革新了的京剧艺术，在某些方面不能不抛弃传统京剧艺术，在某些方面已经高于传统的京剧艺术。尽管传统的京剧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但是它受到内容的限制，在某些方面不能不落后于即使是新生的现代戏的艺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现代戏的新内容要求产生和它相适应的新形式，因而在角色行当上，在音乐设计上，在表演程式上，在舞台美术设计上，老一套的形式必须加以改革。经过改革以后，服从新内容的现代戏的艺术形式，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把京剧艺术推向更高水平。

在《芦荡火种》里扮演阿庆嫂的演员赵燕侠，在《红灯记》里扮演李奶奶的演员高玉倩，从前都是演花旦的，现在，花旦行当的艺术形式不能不被突破。一个为了透过茶馆老板娘的身分而鲜明地显示出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一个为了从家庭妇女的身分中



鮮明地显示出坚定、穩健、沉着的革命老人的气派。这对演員自身說来，行当被改变了也被丰富和发展了。在《奇襲白虎团》里扮演志願軍团长的方荣翔，从前唱銅錘花脸；在《六号門》里扮演胡二的李荣威，从前唱架子花脸。两人在行腔上和做派上，都不受类型化的行当区分所拘束，有时簡直使人想不到他們原来的行当是什么。前者的唱使观众好像面对着一个沉着、穩健而充滿力量的老干部，后者在不唱不舞时，仿佛是一座造型样式化了的圓雕，使这个觉醒了的搬运工人显得全身都充滿了澎湃的革命热情。为了真实地塑造在傳統京剧中沒有表现过的新人物，为了使久經战斗考驗的指揮員的精神面貌不被歪曲，为了使从受压迫而轉化为自觉革命工人的性格和气质演得生动活泼，演員們不受自己原有的艺术素养所拘束，創造了新的艺术，这是符合艺术发展規律的。嶄新的内容突破了原有的角色类型，也就是扩充了原来很有限的行当，这不是很值得高兴的吗？

傳統京剧表演程式的产生，从属于旧时代的生活实际。現代戏表现新的生活内容，不排斥动作的样式化和美化；但是这一切不是套用旧程式，而是利用旧程式，創造新程式。在《奇襲白虎团》里，尖刀班偵察英雄在敌人腹地的夜行軍，那些在风雨、泥路、铁絲网、地雷、关卡、敌哨等重要障碍中行进の志願軍英雄，那些又好看又惊人的舞蹈和武功，不簡單是傳統京剧的“走边”等程式的因襲，可喜的是为了真实地塑造当代英雄的嶄新的創造，所以演員自己一时还叫不出这些新程式的名字。在《送肥記》里扮演錢二嫂的演員董芷苓，利用了她那花旦行当的艺术素养，在表演上很撒得开；但是不能以为角色一再“出門”或“進門”的时候，那些活泼、敏捷而节奏鮮明的身段、台步、手势、眼神，不过是花旦表演程式的因襲；因为这一切始終是以塑造勤劳而又沒有摆脱私有观念的錢二嫂的性格特征为轉移的。戏曲里的无声語言（做或舞），往往較之多余的說話更有表现力，更动人。《紅灯記》不仅創造了不少符合戏曲傳統的唱和白，而且設計了不少很有表现力也很优美的舞和做。当李铁梅为奶奶和爹爹盡完孝，提着紅灯，将要离开不再回来的家，那表现化悲慟为力量的心情变化的舞蹈，使观众仿佛

置身于阶级觉悟的具体过程之中，体验她那即将为新的艰巨的革命任务而有所作为时的内心生活。这些很好的設計和表演，符合戏曲艺术特点；虽然它在程式的利用上和傳統京剧有联系，可是这一切服从嶄新的艺术趣味，是从嶄新的生活实际出发的，所以，在程式上和傳統京剧表演程式很有区别。

不少由革命新内容出发，因而創造出来的又新颖又好听的唱腔，連行家也沒有回答我它叫什么名目。暂时沒有名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現代戏发展了京剧的歌唱艺术。对音乐我更外行；但是也能感到現代戏在行腔上和傳統戏曲有区别，感到音乐上的創造性。李荣威在表现胡二情緒激动时，唱得刚健，在情緒不那么激动时，唱得低沉，而不是一鼓劲地保持着粗豪的类型化的行腔規格。这种变化了的唱法，沒有妨碍人物性格的一貫性，也沒有妨碍形式上的和諧，而是使人物的心理和情緒的变化表现得更真实。我所听过的傳統京剧，沒有川剧帮腔式的幕后帮唱，只有角色在上場門內的干唱（叫做“悶帘”或“馬門腔”），可是在《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演出里，我听到了新东西。当李铁梅从敌人監獄出来，压抑着而又压抑不住滿腔悲憤的情緒，緩步行进着的时候，台后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帮唱。这段帮唱，使铁梅一定要把革命任务担起来的决心、信心的表现，得到了不是前台角色自唱所能代替的感染力。《节振国》这个出色地再现了矿工解放斗争的剧作，在帮唱上显得更有变化。当节振国掩藏在工人家里，期待着党的联系时，台上的独唱与台內的帮唱互相交織着，有的是互相补充，有的近似互相“交談”，运用自如，形式活泼，加强了这一个片紅心向着党的革命工人的精神面貌的刻画，加强了崇高的主题内容的充分表达。我不以为每个現代戏都要有这样的手法，我却在这些新的嘗試中，感到京剧艺术的新变化，新收获。这，也好像打击乐的适当利用；是加强表演与观众的联系的一种手段，它不只为角色心情創造了特殊的音乐化形式，而且这种形式也間接地表现了观众的生活經驗。这是促使观众体验台上角色的条件，借此加强了角色与观众的交流。

形式服从内容，現代戏对京剧艺术的改革，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京剧現代戏既然是一



种戏曲，不像戏曲当然会脱离群众的欣赏习惯；但是只求形式上像戏曲而在内容上脱离现代生活，也会脱离当代观众新的艺术趣味。现代男人没有一二尺长的头发，如果硬要内容服从形式，让情绪激动的胡二像情绪激动的林冲那样大甩其水发，即使做得到，那也是可笑的。如果是这样，观众不仅不会像看林冲受难时那样同情胡二的受难，而且会觉得艺术家是在和人物和观众开玩笑。髻口功、翎子功、帽翅功……这些使角色内心状态得到夸张的外形化表现的传统艺术技巧，体现着戏曲艺术规律，现代戏不拒绝加以吸收和融合，但是因为这一切具体形式已经丧失了它所模仿的具体对象，不可能在现代戏里保持它原有的地位。

这些只能在传统剧目中出现的東西，在现代戏里没有地位，是不是可惜呢？如果从一招一式看问题，这会感到很可惜。如果是全面地，从艺术发展规律看问题，相信新的生活一定会向京剧提出创造新技巧的要求，今后现代戏一定会不断产生新的戏曲艺术形式，那么，某些旧技巧在现代戏里丧失了地位，并不可惜。在艺术里，无例外地不能抗拒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新的绝招一定代替某些旧的绝招。革命的京剧艺术家，在唱、念、做、打各方面，今后更将为观众提供符合欣赏戏曲艺术的习惯和发展了的兴趣的新艺术。

对于把京剧当成战斗武器，敢于创造的艺术家的说来，又真实又优美的戏曲新形式，一定会随实践的继续深入而不断产生。传统戏曲艺术曾经有由烦琐到单纯，由简陋到丰富的发展过程，现代戏艺术也必然要经历一定的发展过程。包括处理布景与表演的主从、虚实关系，艺术家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可以预料，富于生命力的现代戏，在艺术的成长过程中虽然也不免不断出现各种困难，但是较之传统戏曲的成长过程，一定会迅速得多。

艺术家与工农兵结合，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为产生正确、深刻、新颖的主题创造根本性条件，同时为产生准确、鲜明、生动的艺术手段创造根本性条件。《节振国》、《六号门》、《黛诺》、《草原英雄小姐妹》……许多新京剧，在京剧艺术的创造上，主要不是首先依赖传统京剧艺术知识；即使接受传统京剧艺术知识的帮助，也是在艺术家结合群众、学

习群众、熟悉群众之后而起作用的。我们既要反对轻视传统京剧艺术知识的态度，更要反对脱离工农兵生活，夸大传统京剧艺术知识，以为有了这种知识就能把现代戏编好、演好的态度。因为：一切真正新的技巧的产生，不仅是由崭新的模仿对象所引起的，而且包括准确、鲜明、生动地再现生活这一要求本身，是发展了的艺术趣味所引起的。如果脱离工农兵生活，不仅一定得不到如何适当加以反映的对象，而且会丧失敢于大胆创造戏曲艺术的热情和勇气，丧失运用戏曲形式反映生活的艺术才能，丧失自由运用戏曲艺术知识的信心。

继承与创造

群众要求京剧现代戏表现工农兵，塑造新英雄人物，同时也要求它真正是京剧。因此，京剧艺术的革新，不能脱离传统京剧的艺术特性。这次观摩演出的许多新戏表明，艺术上的革新，既是以反映现实生活为目的，也是以传统京剧艺术为基础，既要打破和旧趣味密切联系的旧形式，也要从它那特殊的艺术形式中吸取营养。真正从群众要求出发而对待京剧艺术的艺术家的，在现代戏创造过程中，贯彻了既藐视又重视的原则，运用了既批判又非全盘否定的方法，正确处理着革新与继承的矛盾。

《芦荡火种》斗智一场，阿庆嫂同刁德一之间，正与邪的斗争，很尖锐，在形式上，却是戏曲的。

刁德一：这一个女人不寻常！

阿庆嫂：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

刁德一：她脂言善语双睛亮；

阿庆嫂：他笑里藏奸有锋芒，

刁德一：她态度不卑又不亢；

阿庆嫂：他神情不阴又不阳。

刁德一：她使的什么风，靠的什么港？

阿庆嫂：他到底姓蒋还姓汪？

刁德一：我待要旁敲侧击将她访，

阿庆嫂：我必须察言观色把他防。

这同《革命自有后来人》李玉和与鸠山之间的争论那样，是一种对唱。李玉和同鸠山的争论，是明来明往的唇枪舌剑的交锋。而阿庆嫂同刁德一的斗智，却是双方互相警惕，互相探索，因而这种我一句你一句的对唱，具有“背供”式的特点。这两出戏的



对唱都具备戏曲艺术的魅力，可是它们在观众精神上的作用，后者和前者大不一样。就情节而论，阿庆嫂和刁德一这正反双方，在斗争中都力图掩盖自己内心秘密，都唯恐暴露己方内心秘密。但是作为让观众接受的艺术品，却必须向观众暴露双方的内心秘密，所以双方都向观众直接唱出各人的猜测、判断等心理状态。这种为了明确表达艺术家对生活的态度，因而不拘于素材原始形态的形式，较之话剧里的旁白的形式，可能显得更自由，更有表现力，也可能就更动人。这是从新的内容出发，利用了传统戏曲艺术手法的许多可喜的收获之一。

现代戏不套用旧形式，却不拒绝利用旧形式所体现的艺术知识。我们从《六号门》卖子一场看到，在艺术手段上它和传统戏曲的相似之处，在于舞台空间的虚拟性和人物关系的真实性的对立统一。找不到工作的胡二，走到自家门口，愿意看见亲人，却老是逗留在门外。在门内的胡二嫂，看不见门外的丈夫，却一心盼望丈夫快快归来。这时候，两个演员你一句我一句地仿佛在对唱，而且唱词内容也仿佛是两人面对面地交流着他俩处于困境的痛苦心情^①。这种不受素材原始状态的限制，敢于打破空间条件的拘束，却也真实可信地表现了人物与人物的关系的艺术手段，有革新也有继承，因而它符合观众欣赏戏曲的习惯、能力和兴趣，也加强了观众和舞台上的人物的交流，受到较深刻的感染，得到观众的赞赏。

京剧艺术家尊重和信任工农兵群众对戏曲的欣赏要求和接受能力，所以，当他们为了真实地塑造新时代的人物形象，追求演谁像谁的时候，并不排斥继承戏曲艺术中那些有用的东西。譬如，在传统艺术形式里，虚构与逼真的对立统一，粗豪与细致、夸张与质朴、明晰与入神、重点突出与整体和谐的对立统一，作为戏曲艺术规律性知识，并不因为要适当表现起了根本性变化的现代戏的内容，就根本丧失了它那值得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价值。积极为工农兵服务的京剧艺术家，没有把大胆革新与批判继承绝对地对立起来，而是正确处理着社会主义内容与新的民族形式的关系。正因为革命的现代戏的形式具备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它那革命化群众化的新内容，才能够更强烈地影响广大

观众。

不少演员已经在现代戏的表演上，把民族艺术的革新和民族艺术的继承的矛盾解决得很不错。在《黛诺》里扮演正在觉悟过程中的景颇族姑娘的关麟麟，唱腔和表演都有新的、符合戏曲艺术的一般规律的创造。她在姿态、台步、手式、眼神的运用上，显得一气呵成而又节奏明晰，为观众塑造了在戏曲中才具有的样式化和美化的形象。当黛诺找到了“红星”，不愿意重返封建山官统治着的家乡，拉住解放军女医生的前襟，低着头，仰着脸，注视着对方，突然朝观众方面猛一转身，双眼直视前方，亮相般地“定住”顷刻，然后才道出她的决心：“我死也不回去”。这种不同于话剧的形体动作，配上了念白之后的打击乐“丝边一锣”，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也给观众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发挥了戏曲艺术的长处。这就既不脱离人物性格和环境的真实性，也适应了观众对京剧现代戏的欣赏要求。这种依靠夸张的形体动作，易于掌握地揭示角色内心状态的强烈和明晰的做派，也出现在《红嫂》里扮演解放军排长的演员李师斌的舞蹈上。演员表现英雄受了重伤却极力挣扎，利用了传统戏曲惯用的“劈叉”，使矫健的身段和人物困乏而又自持的特征和谐地统一着，解决了真实与优美的矛盾，成为主角红嫂的很好的配角。

不论是民族艺术的革新还是继承，为了现代戏

① 胡二：(同唱)年哪，逼煞人的年！
胡妻：.....

胡二：(同唱)天哪，杀了人的天！
胡妻：.....

胡妻：你为何不睁眼？
大宝他爹你为何不把家还？
可怜你几天来食不下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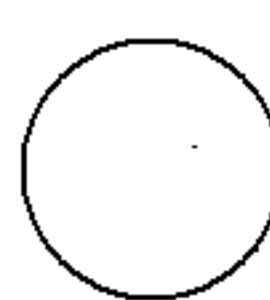
胡二：大宝他娘几年来苦受熬煎！
在我家从未吃一顿饱饭。

胡妻：你在外身无有四两棉！
速归来一处死我也情愿。

胡二：手空空家门难入我进退两难。

胡妻：你可知为妻我将你等盼？

胡二：你可知为丈夫徘徊门前？
.....



发挥教育群众的作用，相应地要求艺术形式适合群众的欣赏要求。戏是演给大家看的，一切艺术手段都是和观众的要求相联系的；哪一个阶级的欣赏要求，哪一个民族的欣赏习惯，都将反过来影响戏剧艺术。只从戏曲反映生活的任务着眼，不考虑戏曲怎样反映生活的特点与观众欣赏要求、欣赏习惯的联系，不能解释戏曲形式的形成和变革，也很难适当利用戏曲的艺术形式，为崭新的创造任务服务。作用于戏曲艺术形式的形成和变革的欣赏要求，是跟随着人们的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着的，而群众对艺术的兴趣，却有民族性的继承性。革新与继承的关系是辩证的。不革新京剧艺术不能适应群众发展着的欣赏要求，不继承京剧艺术也不适应群众的欣赏习惯。京剧艺术的变革，表现了群众兴趣的变革；京剧艺术的继承，表现了群众兴趣的继承。革新以继承为条件，继承以革新为目的；没有革新要脱离群众，没有继承也要脱离群众。

艺术作为现实的反映，不必冒充现实本身。艺术之一的京剧，可以容许变形和虚构，可以容许唱词、道白、动作、服装、扮相的样式化和美化。在实际生活里，要是有人骂人时用歌唱，哭泣时讲究音调的好听，追赶特务时推敲步伐的舞蹈性，……那样，生活岂不变成了滑稽戏？但是，在戏曲里，这一切不仅是美化了的，样式化了的，同时它也是现实的，可信的。正因为观众不要求戏曲给现实作刻板的翻版，而要求以样式化、美化的形式反映它的本质；所以，念白讲究放收、缓急的表现力和悦耳的作用，出门人的行李包成了避免妨碍舞蹈的一巴掌宽的小布卷，吃饭喝酒只稍稍点醒，睡觉时往往是坐着以至于站着（《长坂坡》里赵云以站代睡）。任何艺术都不能也不必模仿现实中的一切，作为综合艺术的京剧，有配合也有分工地利用唱、念、做、打，有割舍也有着重地再现生活的某些方面（而不是一切方面）。例如用强烈的打击乐模仿角色各种情绪状态，表现人们由某种情绪所引起的特定反应的经验，不只是为了造成某种气氛，更不是简单地当效果使用，重要的是加强了艺术的感染力和说服作用。这是符合群众对新京剧的欣赏需要的，所以京剧现代戏不排斥继承这些有用的传统艺术手段。

现代的生活和斗争，无产阶级的英雄，可以在

各种艺术样式中得到相应的形式的反映，京剧艺术样式也不例外。任何艺术样式都有它的特长和局限性，特定的艺术样式要求采取和它的特性相适应的生活内容，所以京剧如何反映现代生活，有它特定的着重点，在符合基本任务的前提下，对不同的生活侧面的再现，可以和必要有所选择。开始，《奇袭白虎团》在舞台上直接再现尖刀班在敌区的活动，包括有事实依据、捣毁敌人军车的惊险性情节；但是演员和观众都感到，这种在电影里可能是很能表现侦察英雄的果敢和智慧的情节，可惜这种明场处理在戏曲舞台上就显得很别扭，愈是符合事实就愈是显得表演不能令人信服。后来只得把这一情节改为暗场的处理，而在舞台上着重表现和歌舞艺术能够协调的其他情节（突破重重关卡）。这种改变，既不损害戏曲艺术的特点和优点，也不妨碍英雄形象的完整性，不妨碍歌颂英雄的主题的明确性。吸取京剧艺术规律性知识而使现实生活在作品里得到了创造性的反映，这也符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艺术借鉴原则，符合工农兵群众对京剧的特定的而不是一般的要求。

坚持革命化

在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中，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京剧改革，已经取得了伟大的然而又是初步的胜利。京剧由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的工具，变成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具，解除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武装；就这一重大意义而论，它的胜利是伟大的。京剧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长期表现旧的内容，因而形成了一套和旧内容相适应的严格的程式，也有区别于其他戏曲形式的特殊风格；我们既要利用它而对它进行改造，又要保持它特定的形式风格，这就需要继续付出艰巨的劳动，而且今后还免不了遭遇各种阻碍和迎接许多困难；就斗争的长期性这一意义而论，这个胜利是初步的。

正因为京剧改革是一场并非轻而易举的战斗，是一种不是轻而易举的革命和建设任务，所以，在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同时，难免存在着某些不够成熟的现象。例如某些戏在剧本上还显得主题不够深刻，人物还有待于进一步典型化，情节结构还显得



不够集中，不够严谨，包括文场戏打击乐的利用或念白的音乐化，某些戏在艺术手段上还显得受了素材原始形态的拘束，还应当把出现在舞台上的一切更和谐地统一起来，进一步把对于事物本身特点的模仿与人们对它的反应，更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了社会主义时代英雄在京剧这一艺术形式中得到既真实又优美、既准确又夸张、既凝练又伸展的反映，从而在适应观众欣赏京剧艺术的兴趣时，使他们受到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利用京剧艺术反映新时代显得不很成熟的缺点，还有待于克服。

但是，从发展看，从长远看，从既得的巨大成就看，现代戏暂时还不很成熟，以至艺术上存在程度不同的缺点，既不足以淹没它那基本上的成就，也值不得大惊小怪。要是夸大它暂时还存在的缺点而抹煞它在主导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就，这就有必要考虑自己是不是真正和工农兵群众一条心，是不是真心拥护京剧革命化，不再迷恋旧戏曲。已经获得卓越成就的京剧现代戏表明，在反复加工继续修改过程中，它们在思想上艺术上都不断地得到了提高。《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节振国》和其他许多现代戏的改编、移植、创造、修改的宝贵经验，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现代戏之所以暂时存在着缺点，同艺术家和工农兵的结合还不够密切，还没有充分掌握作为反映对象的工农兵的精神品质，还没有进一步把群众反映现实的能力化为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充分理解群众长期欣赏戏曲艺术而形成的接受能力，还没有充分理解他们在革命实践中培养起来的新的艺术趣味有关。所以，在怎样放手利用京剧艺术特性的时候，不免受到了一些拘束。当然，对于某些还没有充分掌握传统戏曲艺术的艺术家（特别是并非京剧方面的行家）说来，上述现象的产生，也包括戏曲艺术修养的问题，但是对于多数拥有京剧艺术实践的艺术家说来，这是次要的原因。如果把这看成主要原因，那就无从解释为什么有一些早已掌握了京剧艺术的演员，偏偏在现代戏演出中感到困难，迫切要求改造自己思想感情。

只要不对现代戏采取吹毛求疵的态度，不夸大它暂时存在和可以克服的缺点，那就一定会因为现代戏的出现而感到欢欣鼓舞。那些把传统戏曲看得

完美无缺的形而上学的态度，如果不是对传统戏曲的无知，就是对传统戏曲的偏护。如果传统戏曲只有民主性的精华而无封建性的糟粕，那又何必要对它进行整理改编？即使是在艺术上，传统戏曲必须改革的缺点也很不少。譬如，基本上是一出歌舞兼长的独角戏《林冲夜奔》，有些演员在唱到“英雄有泪不轻弹”的时候，偏偏配合了手指接泪、弹泪等动作。这种有师承的动作，作为唱词的造型化，脱离了特定的人物心理，经得起推敲吗？难道这不就是从唱词的字面出发，为抽象的文字符号作造型性的直译吗？我们没有因为这样的瑕疵而根本否认这种传统戏在艺术上的优点，为什么对于尚属童年的现代戏，偏偏要离开具体条件和具体过程，而提出苛刻的责难？

现代戏那些使人振奋的成就，不是次要的缺点所能淹没的。它怎样把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的出色成就，不是用短短的篇幅所能一一具体记述的。仅就怎样利用成段或成组的唱，从而强烈地表现新人物那种激动的不能自抑的情绪状态，现代戏设计了通俗易懂而不肤浅的唱词。即使没有听过关鹤鹑的演唱，只要能够读读先进的黛诺在她和落后的文帅发生了道路问题的尖锐冲突时的唱词，也会体验到角色的那种如火如荼的革命激情：

（叫头）李医生

（唱）为什么爷爷发了狠？

为什么爷爷打勒丁？

为什么爷爷要听山官话？

为什么爷爷与我不一条心？

一巴掌打出勒丁猎人泪，

一巴掌打得黛诺心儿疼，

一巴掌打得山官哈哈笑，

一巴掌打走了受苦受难的众乡亲！

这样的唱词，写得质朴和自然，写得感情充沛和性格鲜明。词的重复和对比，完全是戏曲的写法。这种写法和它所体现的内容，不只为演员演唱提供了发挥再创造的好基础，而且它自身也就是引起新的观众共鸣的重要条件。

在戏曲音乐里，唱、念都重要。《红灯记》里也有许多动人的念白、念对和歌唱。有一段众口称赞的



念白，是李奶奶向孙女儿李铁梅讲述一家三代的革命历史的七百多字的念白。演员高玉倩发挥了戏曲艺术的特殊修养，音乐化了的有节奏感的念白使李奶奶充沛的革命热情激励着革命观众。李玉和与敌人鳩山舌战时的三副念白，演员李少春、钱浩梁和袁世海都念得很有人物性格，一次比一次更显出斗争的尖锐和深刻。在歌唱方面，李奶奶回答铁梅“我爹死了以后，是谁把我救出来的”那一段的唱（二黄原板），演员唱得慷慨激昂，动人心魄。特别是唱到最后一句“你须要立雄心树大志要和敌人算清账，血债要用血来偿”时，腔往上翻，由沉着转向高昂，最后几个字唱得连贯而又斩钉截铁，好像被压抑的山泉的迸发，精神得很。这种表现了戏曲歌唱特点和优点的唱法，是发自特定条件之下的人物内心状态的，因而是既有审美特性也有认识作用的。

现代戏在艺术上的一切成就，主要是艺术家在一定程度上学习了工农兵的思想感情的结果。同时，因为京剧艺术家的特殊素养服从了搞好革命现代戏的重大任务，所以京剧艺术大有用武之地，而不是特点和优点被埋没。许多过去不爱看传统京剧的观众，现在争取看京剧现代戏；许多过去爱看传统京剧，对京剧现代戏抱怀疑态度的观众，现在也爱看京剧现代戏；这表明现代戏使京剧有了新的生命，也表明它的观众扩大了。这些革命的现代戏反映了五四运动以来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反映了十五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塑造了代表时代、掌握时代命运的英雄人物，而且这一切是利用了京剧艺术这一特殊手段的，而不是所谓“话剧加唱”般地勉强拼凑的，所以，它就有了特殊的感染力量。有些观众说：在京剧里，李奶奶向李铁梅回述红灯的历史，因为利用了抒情的唱或念白，比看同一内容的电影更受感动。这是可能的。因为京剧这一艺术手段确有为话剧所没有的特殊的感染力，何况观众有各人不同的习惯和偏爱。内容和形式都很好的京剧现代戏，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有了较高的质量，能够引起广大观众的强烈共鸣，这是谁都抹煞不了的。

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反映，是

现代戏内容最主要方面，是今后还要格外着力的方面。旧时代的英雄人物（例如诸葛亮、穆桂英）为什么能够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也得力于戏曲的宣传。社会主义时代不断涌现的英雄（例如雷锋、谢臣、欧阳海等），在革命的各个战线上进行了伟大斗争，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精神品质上成为群众仿效的榜样；这样的人物应当是京剧现代戏大力反映的对象，也是在艺术上体现无产阶级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何从当前革命的对象、性质、任务的具体特点出发，把激动人心的情节和典型化的英雄人物形象统一地再现出来，使演出具备及时的教育作用，长远的艺术魅力。这，较之掌握京剧艺术，在新的要求之下练习京剧艺术的硬功夫更重要的是：艺术家自己深入工农兵，在思想感情上进一步工农兵化。许多演员热情地表示：为了现代戏获得更加辉煌的成就，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也就是艺术家自身彻底的革命化群众化。他们说：要说有什么“派”的话，首先应该是一个“革命派”；在京剧革命中，我们宁作现代戏的新兵，不作传统戏的老将。这是为京剧彻底革命化作了宝贵的思想准备。

京剧现代戏的建设，是一项艰巨的革命任务。不论是为了进一步掌握京剧艺术，还是为了进一步掌握新人物崇高的精神面貌，都不会没有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障碍，都不会没有随时间的进展而出现的新困难。彭真同志在大会闭幕式上教导我们必须坚决贯彻京剧的革命路线时指出：“在我国，当前根本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就表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在这种尖锐的斗争中，对艺术家和评论、研究人员说来，都是严峻的考验和必要的锻炼。可喜的是先进的也是正在自我改造的京剧艺术家表示，决心坚决贯彻大会精神，坚持党的文艺方向，同工农兵密切结合起来，继续和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以及不可避免的困难作斗争，一定要把已经很好地开始了的京剧革命进行到底。只要有这种坚定的意志和行动，一切困难和阻挠，都一定会迎刃而解，使革命的京剧现代戏在革命斗争中发挥愈来愈强大的威力。

